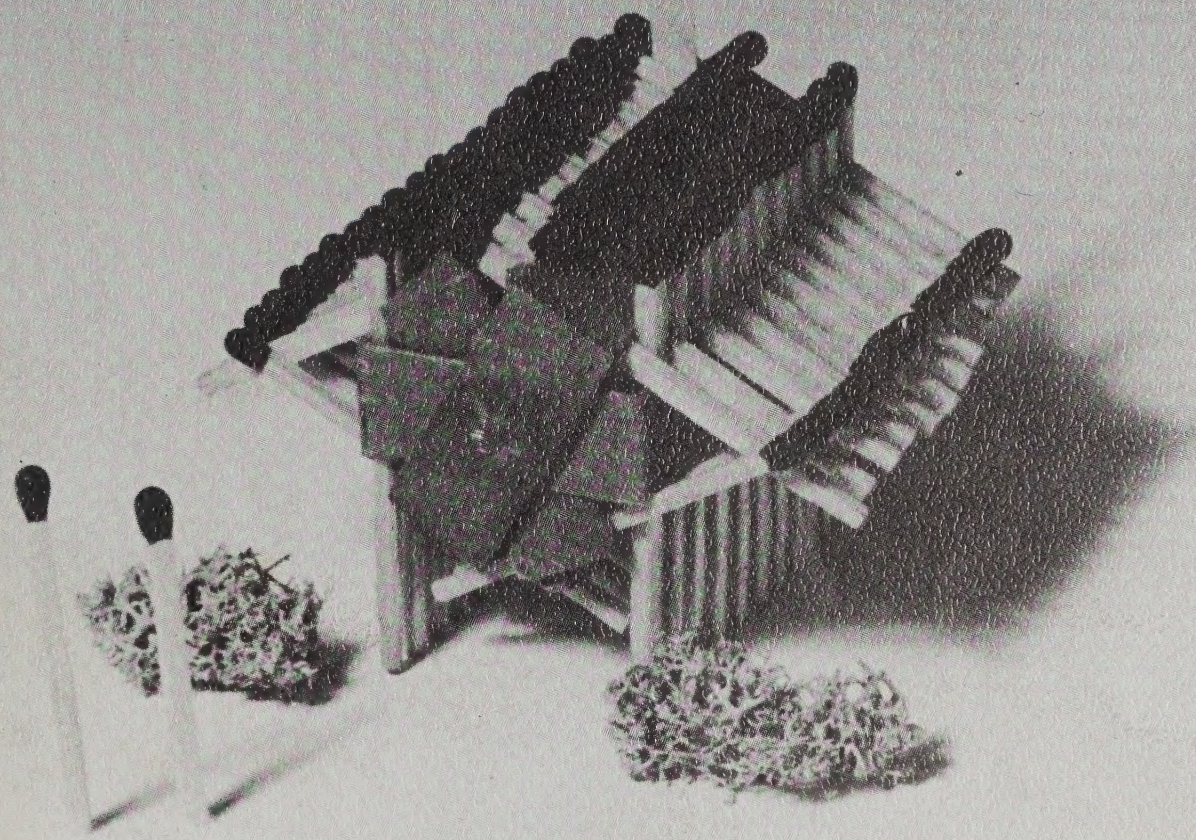
敢欖

L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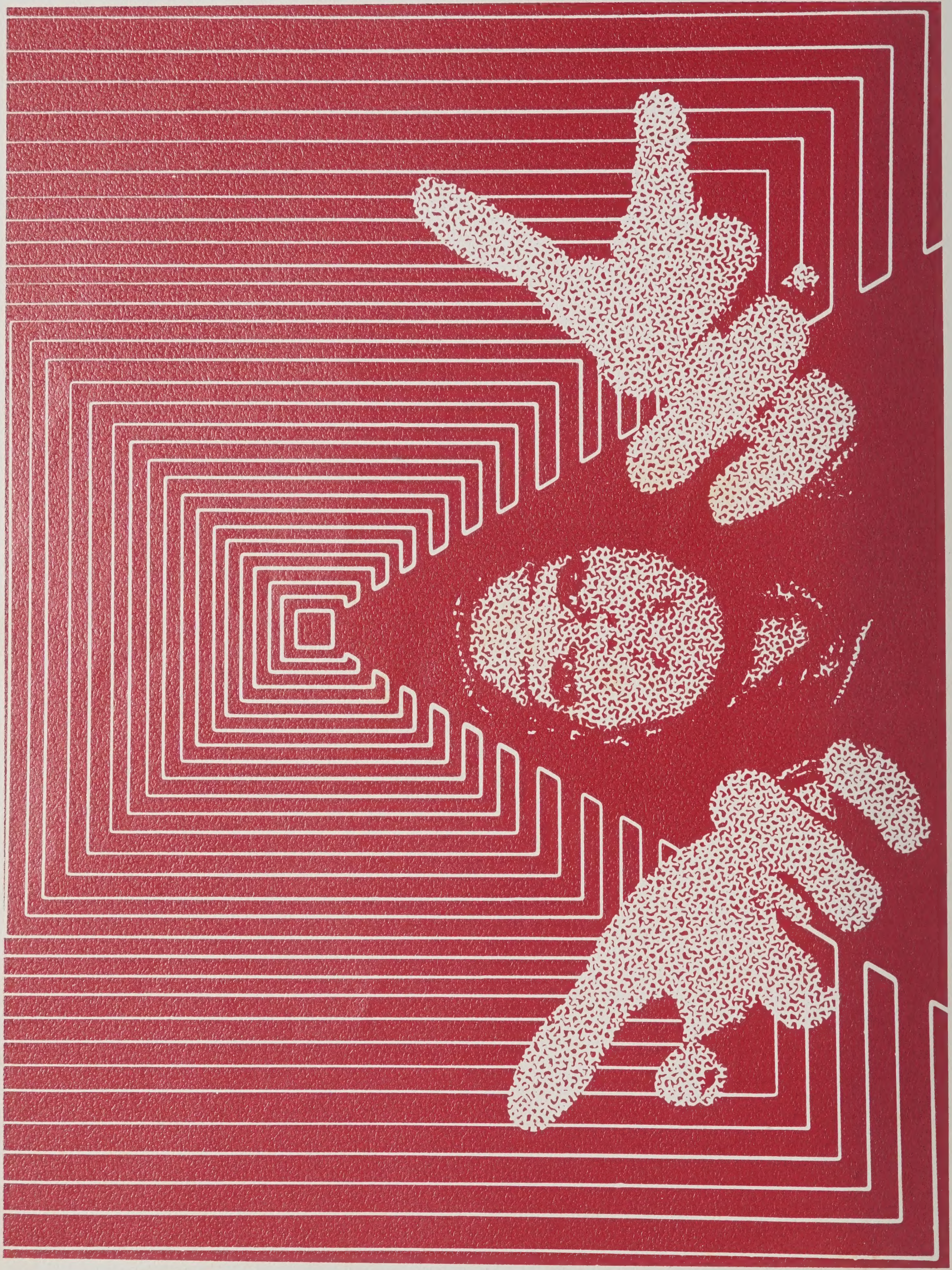
44



合一！
合一？

3 1761 12394009 0

r
551
643
36
24:no.5
984:Feb.)
ANADA_HK



教會合一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2 2026

我不但為那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
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
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約17：20－21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
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
一意彼此相合。 弗4：1－3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
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
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林前 1：10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
你那裏。聖父阿、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
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 約17：11



為何談合一

專題小組

為何要談合一？因為「合一」是一個正存在的問題，為何「合一」在香港教會是個問題？簡單來說，就是香港教會似乎不大「合一」。或許在此有人會提出疑問，究竟香港教會是否眞的不合一？專題小組不敢貿然回答這問題，只可以說，縱使我們不以「分裂」來形容香港教會；然而種種事實顯示，教會在表面昇平的氣象底下，委實存在不少內在矛盾，只要有任何突變，其披露將是一觸即發的。這就是專題小組的大前提。本文就嘗試陳列香港教會的形勢，並且指出「合一」問題在今天的適切性。

香港教會，分裂的身體!?

教會是甚麽？聖經上說教會是㈠基督的身體（弗4：11—16）；㈡上帝子民的聚集（彼前2：9）；㈢聖靈的殿（弗2：19—22）。所有信徒都在同一身體中互相配搭作肢體，共同作成基督交付的使命。將這抽象的概念放到現況中，我們很難說香港教會好像聖經中描繪的一般。香港教會除了架構龐大、組織複雜之外，羣體與羣體之間不瞅不睬、各自為政甚至互相排斥也是明顯的事實。我們大概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瀏覽一下香港教會的形勢。

宗派問題

香港教會可說是宗派林立，五花八門。現時約有超過一百個不同宗派。雖然六十年代以後，西方宣教士漸次撤退，然各宗派仍保留了相當濃厚外國差會的傳統特色，在崇拜禮儀、聖禮、傳道牧養、信約、組織管理、牧者長執制度等方面都十分不同。在三十年代，中國出現了一些非宗派的獨立教會，例如小羣、耶穌家庭等，這類教會的模式特點也影響了不少在六十年代香港發展的地方教會，例如福音堂。隨着時間的發展，這類沒有差會背景的教會也儼然成宗成派，自有其特式。

在二、三十年代，中國教會中宗派的紛爭十分常見。但在香港，近年已不見有劇烈紛爭。然而傳統上，宗派之間因着濃厚的「派別主義」，所以依然各自為政，不相往還，故此彼此瞭解仍很差。另外，教會與教會之間彼此幫助亦甚少，例如有些大教會每年有過百萬的盈餘，而一些小型教會則求「財」若渴，顯示出資源的浪費，見證的削弱。

神學陣營

除了宗派外，另一個理解香港教會形勢的有效入手方法就是從神學陣營的角度。而這也正顯示了教會另一層次的分歧。

嚴格說，香港大部份教會都是所謂「福音派」或「基要派」的傳統；特色是嚴守聖經權威的絕對性，拘泥於闡釋一套信仰條文。教導著重個人敬虔生活，宣教路線上較著重佈道事工，「救人靈魂」，而不着意於信仰在變遷社會中的適切性。對於「非我族類」者，慣於採取一種不瞅不睬的態度。

第二類與「基要派」教會立場相近但卻有較理性及開放態度的就是一種在七十年代漸漸壯大的「福音派」陣營。突破、香港學生福音團契、中國神學研究院三個機構代表。比較上受英美的福音派神學影響，強調教義的整全性，傳福音和關社的平衡等。對異己者較能有對話的態度。

與上述派別相對的是所謂「普世派」的陣營，得名於「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在香港可以基督教協進會為代表，而接納這路線的主要是一些大宗派如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信義宗等。較着重與各宗教、宗派及現代思潮對話，宣教方面十分看重社會參與、教育和服務。而不大着意於建立一套神學信條，與「福音派」比較是兩個十分不同之側重點。

除却以上三個主要陣營外，香港教會還存在着一些新興勢力，有着另一不同的思想型態及氣質，例如一些所謂「邪教」或極端一點的靈恩派，採取一種關閉式的我行我素態度。又如「門徒訓練」，掘起於大學校園，有着不少跟隨者，然却與傳統地方教會漸漸脫節。

傳統上，各陣營均慣於互不瞅睬，甚至在一些事件上或情況下採取排斥態度，互相扣帽。總之，神學陣營的分歧乃是香港教會的隱憂。

教會外圍機構的興起

教會外圍機構的興起乃是香港教會近十多年來的發展，主要是因應着社會變遷，教會工作發展需求而出現。這些機構均有其特別工作範圍及目標，例如工人工作、學生工作、文字工作、輔導、廣播等。然因着這類機構的工作內容或方式比較上前衛，故並不為所有地方教會所接受，有的採取猜疑的態度。而這類工作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及財力，故此也易和地方教會競爭資源，因而產生不少矛盾。總之，這些機構與地方教會仍未能好好的互相配合，而機構的發展壯大也顯示出地方教會的貧弱無力。

從宗派問題、神學陣營、地方教會與外圍機構等三方面看，香港教會毫無疑問是充滿分歧的，在時局變動之時，其矛盾是一觸卽發的。究竟在這複雜分歧的形勢下，教會合一是怎樣一回事？各教會羣體間又應該如何實踐合一呢？

香港前途與教會的合一

在今天這個時候談教會合一是更為適切的，因為在九七大限的前景下，香港前途問題將可能成為引發香港教會分裂的一個導火線。這裏並不打算深入分析香港前途問題。只是要指出在香港必須歸回中國的大前提下，香港教會必將成為中國教會的一部份，中共現時的宗教政策亦將大有可能實施於香港教會。

自從七六年四人邦倒台後，中國教會漸漸重建。「三自」運動在七九年初開始活動，於八〇年十月，在南京召開了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更組織了中國基督教協會以統籌教會的重建及工作。在這情況下，中國教會現時宣稱他們經已走上非宗派主義的教會時期（註一）。在官方政策下，亦惟有這「三自」教會是中國合法的基督教會。

對於香港教會來說，中國教會的挑戰就是現時五花八門，充滿派別分歧的香港教會將如何融入中國的「統一」教會中呢？香港教會又應如何理解「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呢？若然態度分歧，又怎辦呢？《突破雜誌》的總編輯吳思源先生曾將面對九七前景香港基督徒的態度分為五類（註三），足見可能之分歧。對中國教會的分歧態度將是香港教會合一的一大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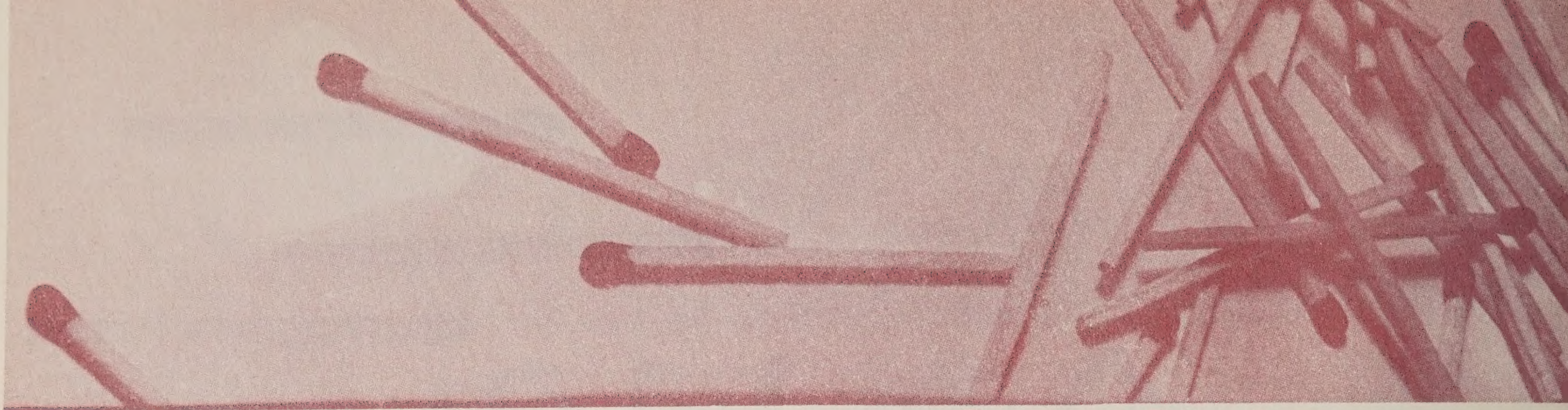
小結

看過對香港教會形勢的一點簡介，我們可以肯定教會內部是存在種種可能的分裂因子，在在可以威脅香港教會的合一。並且在八十年代的今天，面對九七問題的影響，討論教會合一問題更是急不容緩。合一的起點是開放自己，瞭解別人，增強溝通對話，願我們均以一個冷靜理智的態度來思想這個問題。

（註一）參蔡文浩「中國教會——昨日，今日，明日」，輯於《主愛我們到底》中國基督教代表團訪港文集，一九八一年，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出版。

（註二）有關資料可參考《中國與教會》雙月刊，由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出版。

（註三）見吳思源，「九七陰影下的基督徒」，《門徒訓練》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吳氏將香港基督徒的態度分為五類，㈠「維持現狀」派；㈡「投奔怒海」派；㈢「殉道」派；㈣「認同」派；㈤「承擔」派。雖然對象並非直指教會領袖，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分歧。



編者按：

從歷史上看，「合一運動」正式開始於二十世紀初，在數十年間成爲全球性的運動，而「合一」這口號在香港亦喊了許多年，只不過沒有多大的成就而已。隨着香港前途問題日益逼近，長久以來被遺忘在香港基督徒生活圈子外的中國教會，忽然間顯得實在起來。因着中國大陸的三自教會是標榜「合一」，反宗派主義的教會，連帶「合一運動」這口號亦重新響亮起來。

《橄欖》在這關鍵的時刻處理「合一運動」這專題，一方面希望檢視香港教會的宗派問題，透過另一角度讓讀者了解我們身處的香港教會的面目。另一方面亦想探討「合一」這概念的含意，免得我們「不識盧山眞面目，却只緣身在此山中」。

在開始這題時，專題小組走訪幾位香港教會領袖。他們分別是：

(1)郭乃弘牧師——基督教協進會的總幹事。而協進會是推動「合一運動」最力的機構。

(2)鮑會園牧師——香港播道神學院院長，是福音派傳統下的一所神學院。「眞理的裝備」爲鮑牧師最近期的著作。

(3)梁林開牧師——基督教協進會副總幹事，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副主席。

(4)張樹一先生——官塘喜樂福音堂的負責人，該福音堂是基要傳統的教會典型。

(5)鍾海光先生——香港的教會屬下光愛社會服務中心總幹事，是該會長老之一。代表了新興的邊緣教會。

以上幾位被訪者的談話內容將會第一身的形式寫出。主要是爲了行文流暢及減少冗贅，方便讀者閱讀。訪問主要是環繞幾個核心問題進行：

1. 香港「合一運動」的簡略發展
2. 何謂「合一」和「合一運動」
3. 對香港的宗派及超宗派機構的短評。

在此順帶一提，我們訪問「香港的教會」時，發覺該會與《橄欖》接觸主要是期望溝通而非討論「合一」。故此對宗派問題沒有作出正面的談論，所記錄下的亦僅爲鍾海光先生的個人意見。

下列稿件除鮑會園一文外，其餘均未經被訪者過目，文責由編者自負。

鮑會園牧師

「合一」的意思有兩個層面。第一，就是屬靈的事情上：就是敬拜、信仰，及一切涉及與神關係的事情。這是最重要的，在此與信仰不同的人，例如摩門教等，我們沒有可能有屬靈的合一。第二個層面就是在事情上的合作，在此我跟誰人都可以合作，比方說發生大火災，我可以跟任何人一起合作參與救濟工作，任何信仰的人都可以。我只能說，在我認爲對的聖經標準上看，與我信仰生命相同的人，我才可以跟他合一。至於合作工作則什麽人都可以。對於非福音派圈子中，他們對基要信仰可能有不同的註釋。但是否合理，就要看他們能證明他們的立場是合乎聖經。聖經是神的話，信仰的最高標準，我不能接受不合乎聖經的結論。

淺談合一運動

「如果合一運動是鼓吹教會組織合一，我要問這樣的目標是否對？組織合一是否可能？或是我們根本否認這目標的合理性。組織上無疑是有一定的成就，但按眞正的教會標準看，我懷疑這是否眞正的成就？另一方面，就算參加的機構是多了，但這是否眞正成就？」

「我認爲信仰立場一致的教會是應該更加起來合作做點事了。特別現時面對着一九九七的問題，九七年後，教會一定不容許有宗派的存在，那是教會的一個考驗，所以我們現在便應該加強合作，思想對策。怎樣合作？跟什麽人合作？在什麽事情上合作等問題，實在是教會應該嚴肅地思想一下的了。」

對超宗派基督教機構的感受

「在香港，推行「合一運動」最力的要算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他們的目標很好，但方法我則不能完全同意。他們給我的印象就是：只要大家合在一起，並不需要理會大家的屬靈或教義根基如何。只要名義上是基督教的機構便可以合在一起，而不理會其教義是否正確，這個我不同意。

」另一個最具規模的PARACHURCH　是華福會。他們的主要目的也是聯絡各基督教會，推動合一。不過，他們的立場是只聯絡那些眞正在基本立場上，承認我們的救恩的教會肢體。他們並不會接納安息日會及天主教等，我覺得他們是絕對可以支持的。」

「理想上說，神學院是應該超宗派限制的。但實際要做時却是有困難的。有些宗派因爲有深厚歷史背景，教義禮儀方面有很大特色，例如信義宗教會，所以需要自己的神學院來訓練工人。這便很難怪有些神學院不能超宗派了。不過我同意神學院的服務範圍及收生制度確是應該廣一點。」

我覺得各宗派之間應有對談和合作。整體來說，教會的「合一」工作在香港確是做得不大好。其實在大原則，諸如救恩觀、聖經觀、耶穌是神等大眞理上，我們應該堅守，其他如水禮與浸禮，牧師或是長老等問題不是聖經上清楚教訓的，我們毋須太執着的。

鍾海光先生

香港的教會·一城一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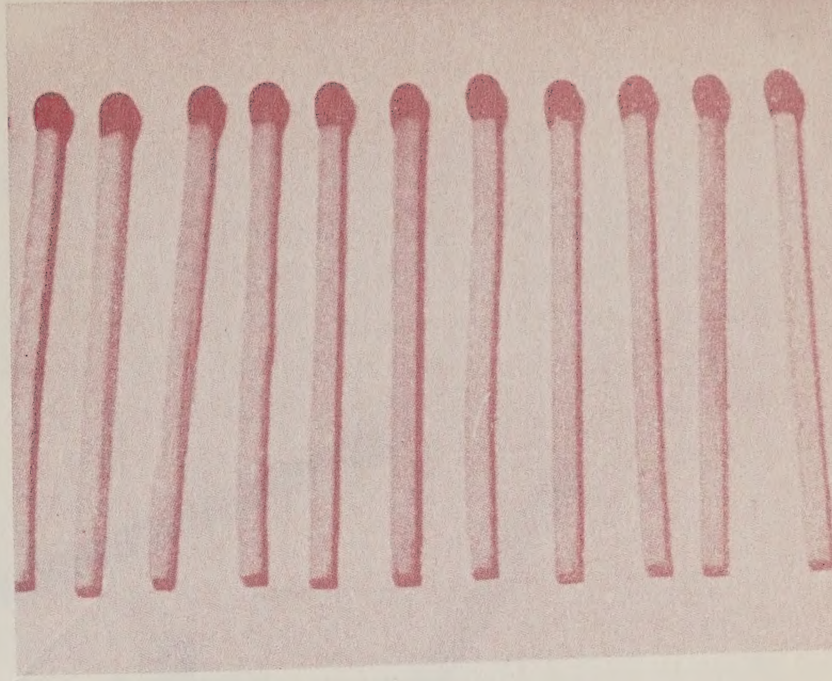
我的名字叫「香港的教會」，就如新約中『以弗所教會』、『哥林多教會』一樣。

觀念上是源自倪柝聲的一城一會。試想想香港廿多萬基督徒如果配搭得宜，各行各業都有信徒的負擔，如在製衣業上傳福音，電子業上傳福音，又或者各人的恩賜合起來，例如成立一基督徒詩班。我相信可在香港帶起一個福音的復興。

當然這不意味着所有弟兄姊妹都要到一處地方聚集，更不是一個超級宗派的出現，而是我們承認，在一個地方裏有一個屬靈的教會。教會的合一代表屬靈的合一，不單是口說，也是行動上的。

現在香港的教會很明顯太分散了，以致福音是照傳，却忽略了合作所能產生的大力量。

對於外間的宗派教別，我個人認識不多，亦不打算詳加討論，但就個人粗淺的了解，有所謂「基要派」，原則上是滿意的。至於其他嘛，主要就是信和不信的分別。當然這不是指全體內容上的差異，而是在某些眞理範圍上有分別。



郭乃弘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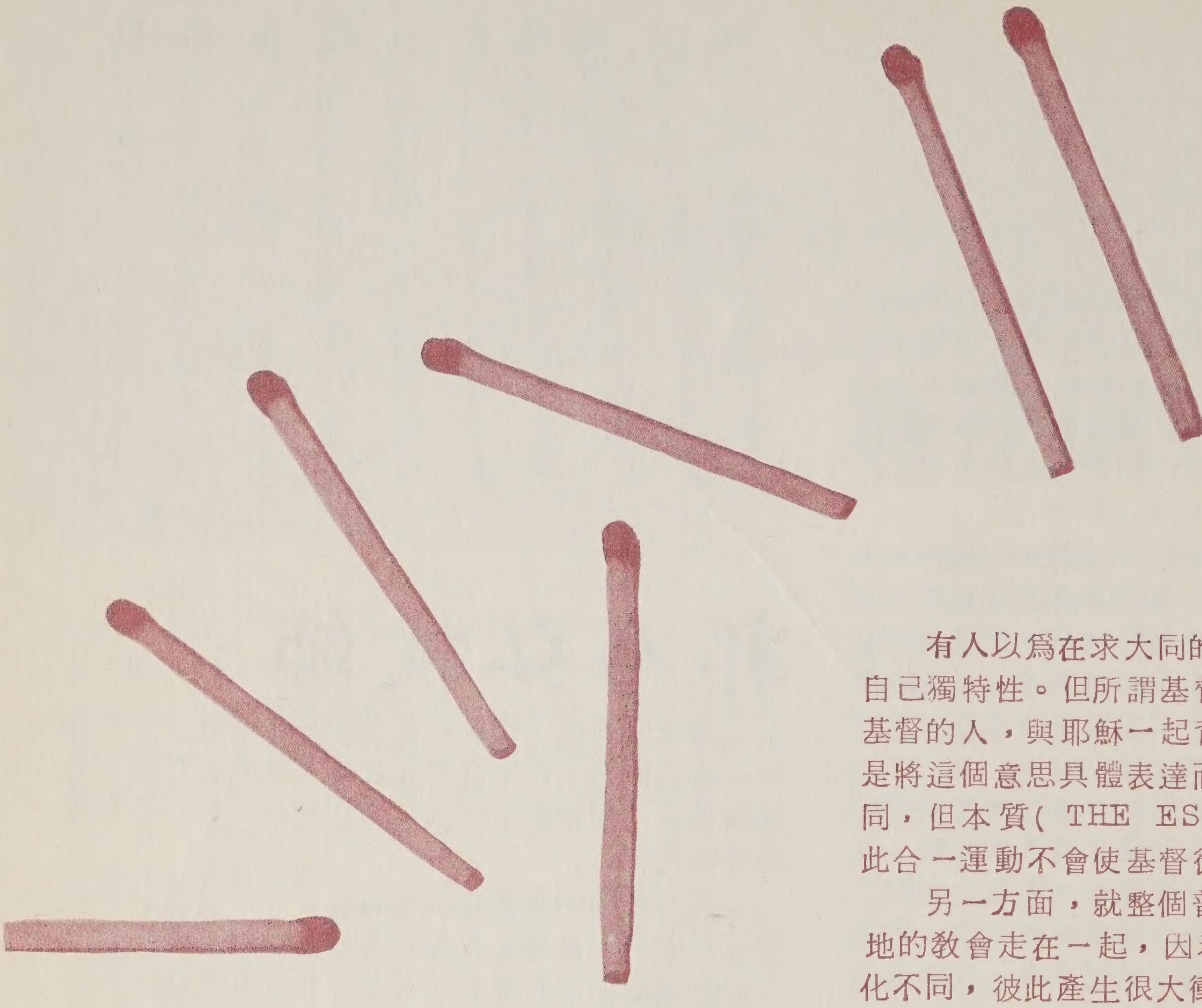
過去卅年來，香港教會在合一方面有多方的嘗試。原因之一：香港是彈丸之地，在基督教圈子裏活躍於合一運動的常有機會聚在一起，於是合一運動容易推廣。

另一個原因是環境所迫成的，例如國內教會是無宗派的，若香港各宗派的教會希望聯絡國內教會，先要透過香港協進會的聯絡，例如參與協進會的訪問團，於是各教會走在一起。另外還有很多其他問題促使教會走在一起探討，例如九七問題，教會婦女地位問題等。所以說是環境因素促成教會走向合一的。

其實中國教會可以說是個「受害者」，因爲從前世界各國各宗派差宣教士來華，每個公會都有獨特的政策和興趣，中國於是成爲一個傳道工場（MISSION FIELD），後果自然是宗派林立。但四九年後的中國教會，實行三自，於是教會可以自主，不受外國差會的政策和興趣所限制。因此各宗派有更多機會合作，爲本地人做事，一起傳福音、做服務等。所以，離開差會獨立，與本地教會認同，是促使教會主動合一的因素。

何謂合一運動

合一運動可分幾個層面來說。首先有機構上的合一，例如七五年香港的循道公會和衞理公會聯合爲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第二個層面的合一是指合一意識的推動，包括意念和行動的推動。在六、七十年代所推動的「共同使命聯合行動」就是意念上的推動，至於行動方面，聯合醫院的成立是一例子。第三個層面的合一是推廣特別工作（SPECIALIZED MINISTRY），例如協進會屬下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等，這些都是由各教會聯合組成的。第四個層面的合一是教會之間基層上大家彼此了解，例如世界公禱日、合一祈禱週等活動都是爲了增進彼此認識。



「合一」運動的目標是肯定，無需懷疑的，但任何事物發展下來，必然衍生意想不到的困難。比方說機構上的合一是有好處的，這樣會使見證能力增大，而工作能力和資源亦會增加。但是亦有其不好處的，各宗派會因在機構上合一而使本身的獨特優良傳統失落了，南印度教會便是個好例子。另一個不好處是造成組織上複雜化，人爲的制度比傳福音、做服務等意識來得強。所以協進會現在的工作重點不再是促使教會機構上的合一。這是我們在整個過程中學習如何去克服的。在合一的道途上，我認爲最重要的是讓我們忘記大家的不同點，努力於共同的。我們一起向世界宣告世界只有一位上帝，宣告祂在世上的作爲，和祂絕對的權能（THE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GOD）。「合一」是一個運動，所朝着的方向，就是要找出那個最大共同的目標，忘記大家的相異點，「合一」不是靜止的。

存小異而求大同

首先我們要承認各教會在神學上，使命上是有分歧的。但是今天我們設法忘記這些分歧，看看有甚麽相同的，然而就客觀環境的需要來合作。教會的存在是爲了服事世界，我們不應關在教會的四面牆內定工作議程，教會的議程應該是由世界的需要來定的。教會應該按着世界不斷轉變的需求來作回應。在這點上，我不覺得教會的分歧會成爲很大的障礙，我們可以不談這些分歧。

有人以爲在求大同的前題下，基督徒容易喪失自已獨特性。但所謂基督徒，廣義來說是跟隨耶穌基督的人，與耶穌一起背十字架。基督教的信條只是將這個意思具體表達而已，表達的方式總會有不同，但本質（THE ESSENCE）仍然是這樣，因此合一運動不會使基督徒身份模糊。

另一方面，就整個普世教會運動來說，世界各地的教會走在一起，因着大家的神學背景不同，文化不同，彼此產生很大衝擊，並帶來新的激發。即如就對基督徒的看法來說，有很豐富的新突破。究竟在二十世紀，我們怎樣做一個負責任的基督徒呢？教會在二十世紀有什麽使命呢？以前，普世教會協會主要談社會公義，支持民族解放等，現在都受了保守教會的影響，漸漸也關注保守教會所談的問題。因此我覺得因着彼此的衝擊，使我們對信仰有更豐富的理解。

基督教協進會

協進會本身是一個「概念」，別人將它看爲一個機構只說對一半。協進會屬下有很多機構，但它本身不是機構。協進會是一個FORUM，讓大家一齊來參與。有人說協進會有特定的神學立場，又有人說是新派的，我看這些都是誤解而已。根本來說，合一運動並不是設法幫助各教會重建（REBUILD）信仰。合一運動，就是讓我們一起來面對這些問題，一起探索解決辦法。合一運動是積聚了不少智慧，是一般沒有ECUMENICAL EXPOSURE的教會所沒有的。其實，在教會裏有一個很大的誘惑，就是以爲問題是有簡單答案的，其實是沒有的，世界不斷在變，今天可能有簡單答案，但明天這簡單答案已不再適用了。合一運動就是讓我們一起藉聖靈的引導，努力找尋答案。

在合一道途上，永遠達不到每個人都認同所有的，在我的經驗裏，這個永遠不會達到。然而，合一却是一個需要不斷努力的過程，而合一的精神我們要常常持有，我們不批評別人，只欣賞別人值得欣賞的，若能做到這些，已是合一見證的好開始。

張樹一先生

合一的意思

「我看聖經中合一意思是指在基督裏，信徒在信仰靈命上的合一(約翰福音17章及11章)。所謂信仰上合一就是聖經說的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同一盼望及領受同一聖靈。具體來說就是在基要眞理上一致，即是聖經的權威；獨一眞神；耶穌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是唯一救法；因信稱義；主必再來等。信的人雖然都在同一身體裏，但却是不同的肢體，恩賜不同、功用和責任也不同，故此應該彼此學習配搭。至於組織工作方面，我看若我們對基要眞理的信仰相同，則我們已在基督裏合一了，並不需要推動什麼組織工作上的合一。只要不違背聖經眞理、做法、形式和組織等是不需要劃一的，這就是所謂UNITY IN DIVERSITY了。」

UNITY IN DIVERSITY 落實在地方教會

「在一間教會中，我認為如果人人都有一套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則會破壞合作，損害了整體的見證，故此是不應製造DIVERSITY的。在一間教會中，應有次序的分別，會友應該遵從及順服帶領的人。」

論所謂「新派」及邊緣勢力

「「新派」是一個空泛的字眼，傳統上是指所謂「自由派」神學，「自由派」亦即是「不信派」，傳統上是正統教會所不接受的。不過要強調的，就是在「新派」中也可能有人清楚得救的；同樣在我們「福音派」或「基要派」教會中，也會有人信仰不純正一樣。所以是因人而異的。」

「至於一些新興的邊緣教會勢力，我看大致上他們的基本信仰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香港的教會」便是好例子。當然在做法和側重點方面是有偏差，但我不同意稱他們為「邪教」，他們至少比那些不信基要眞理的人好。」

對現時教會形勢的意見

「香港教會雖然宗派林立，但我認為大致上是合一的。因為香港教會普遍都是信仰純正的，所以也是合一的。為何我們認為宗派有問題，就是因為傳統上，確是有些宗派整個體系是不信的(編者按：當記者追問是那些宗派時，被訪者表示不便公開)，但同一道理，不信的宗派中有信的人，信的宗派中也有不信的人，所以在信的人之間彼此合一是沒有問題的。」

「對於現時很興盛的福音機構，我認為在各自作肢體，因着不同恩賜與託負而負擔不同責任的角度看，那是很好的。而機構們也應該集中力量做那些因着他們設立目標而專做的工作，而不應太多心。但我現時也觀察到福音機構的兩個危機。首先是一個機構兼做多種工作，以至經濟、人手、專門人才方面都不夠，於是「週身刀，沒有一張利」。第二就是有些機構插手做教會的事情，涉及宗派的問題，以至挑起了弟兄姊妹的懷疑，攻擊自己的教會，並帶來混亂。這是不應該的。」(編者按：被訪者並沒有具體指出什麼機構、什麼事情及其他情況。)

評推動教會聯合活動的機構

「在三個推動教會聯合活動的機構：華福會、華人基督教聯會和基督教協進會中，我認為華福會做得最好，能夠聯絡起信仰純正的華人教會，例如《今日華人教會》月刊便是很好的貢獻。」

「華人基督教聯會可能因為參與工作的人全是有職的牧者，而無全職工作的同工的關係，故此工作較少，只做一些一般認為基督教應該要做的事情，例如開辦老人院、孤兒院和墳場等。對於肢體間歸一方面，並不能做到多少。」

「至於基督教協進會，我認為實際上對教會合一並無大貢獻。他們只注重一些社會問題和勞工問題方面的工作。他們的「教會合一運動」也只能在他們自己內部，即其組織內之會員教會之間推行而已(編者按：基督教協進會屬下的會員教會包括有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聖公會、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崇眞會、救世軍、香港及九龍佑寧堂、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基督教門諾會及一些外語教會等)，在其組織以外的教會並不見得做到合一。」

個人的態度

「在我個人來說，我三個組織都沒有參加。我看合一與否不在乎是否參加這些機構，而是只要信仰相同，我們便合一了。如果這些機構所舉辦的活動是我需要的，對我的事奉工作有幫助的，我便去參與，若不，便不去了。這是我的態度。」

梁林開牧師



就聖經來說，彼此相愛是耶穌基督離世前叮囑門徒的教訓。但羅書信亦教導我們互爲肢體。而我們的會祖JOHN WESLEY約翰衞斯理亦很深的影響了我們。雖然JOHN WESLEY創立了METH-ODIST CHURCH ，但他一生至死都爲聖公會牧師，他是在無可奈何、被排斥的情況下才創立ME-THODIST CHURCH的，但是JOHN WESLEY一直都認爲教會應該合一，在他一篇著名的講章「大公精神」裏，他更表白他對合一的觀點。在他來說，只要是在耶穌基督裡就是兄弟姊妹，這個看法深深影響我們。當然這個看法是很廣的，但我們並非欠缺自己的立場，只是我們強調尊重其他的宗派，故此循道衞理會本身是十分開放的，我們沒有一套特定的信條，只要口稱耶穌爲主，我們就可接納，並正因這緣故，METHODIST CHURCH 在整個合一運動上就表現得很先進。在南印度教會、加拿大的聯合教會及澳洲聯合教會，我們都有份積極參與。現在香港循道衞理會的聯合也只是整個合一的開端。　們並曾與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相討「合一」問題，以此爲我們邁進的目標。當然要合一就先要走「合作」的步驟，進而爲眞正的聯合，是故我們亦參加了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及基督教聯會兩大機構。

簡而言之，我要強調的是開放的態度。因爲一方面各宗派都有自己的神學立場，在合作上更需要尊重彼此的意見，要是持有成見，態度不開放，那就甚麽也辦不成了。衆多宗派聚在一起，神學上的分歧固然免不了，但我想這些基本上是神學家的問題。

「合一」首先是合作，進而便是機構組織上的聯合，最終目標是耶穌基督所說的合而爲一。當然有些牧師註釋「合一」爲教會間合作，非成爲一間教會。但我的看法是耶穌基督所說的，是指一個的教會。

從宗派到超宗派

就我熟識的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來說，是於75年由循道公會及衞理教會聯合組成的。其實兩會原屬一宗，聯文名稱爲METHODIST CHURCH 。祇不過美國及英國的差會到中國大陸傳教時，有了默契，各自在內地成立教會。在英國差會轄下的就稱爲循道會，而美國差會的就叫衞理會。所以才有循道宗和衞理宗。四九年後遷移到香港，由於事功上的需要，又再促使兩會聯合起來。事實上，整個METHODIST CHURCH 不斷的聖公會、信義宗甚至天主教展開對話，在英國，我們與聖公會商討「合一」到達投票決定的階段，只因不能取得三分二票數而已，而反對的也是一部份較保守的聖公會的牧師。

現時的香港的基督教宗派林立，並各有各附屬機構，如神學院等。彼此間在以往是互不往還的，但我個人以爲作爲「合一」的表現，是不應讓這種情況蔓延下去的。我個人不介意別的宗派的信徒和我們一起領聖餐，因爲這是靈裏合一的表現，我亦鼓勵神學生到不分派別的崇基神學組進修。現在分宗派的建立神學院是相當浪費的，其實香港只需兩間神學院，一謂自由派，一謂福音派，只要在神學上談得攏的就組織起來，無需分甚麽基要派、福音派、自由派等等。只要有人口稱耶穌爲主，那就是基督徒，不論，他有何看法，我都不能定斷，就是人稱「社會福音」的，甚至「靈恩」的（CHRIS MATIC ）我都不以爲然。當然要是三位一體也不相信，那些就不是基督徒，很難談合一了，但我想最要緊的，還是要以寬大態度接受別人，但無論如何，今日的香港教會間的聯合是比十多廿年前要好得多的，至少已沒有互相攻擊、詆譭的現象出現了。

回顧前瞻與遠望

以歷史爲鑑，中國教會曾經在歷史上有合一，如以往日本統治香港時及現在所謂「三自」的中國基督教協會，都是在政治因素下促成了教會合一。既然以往合一是受外來因素影響下，很勉強及無可奈何地促成，爲何今天我們不就拿「合一」來談談。我常常想如1997要實現，中國要收回香港主權，教會會不會走向合一呢？究竟合一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我以爲這是今日教會要思索的問題。當然我不會以97來「推」合一，但假如歷史的趨勢是要教會走向合一，那我們就得正視它。

目前有許多社會性事件，如爭取興建東區醫院，促成了基督教不同堂會宗派走在一起合作。對於這些，作爲社會一份子的基督徒是責無旁貸。但這些聯合行動是較被動的，事實上，傳福音是可以主動地促進合一的事功。

以往的葛培理佈道會是很好的例子。基督教聯合醫院亦是全港基督徒所支持的，是在基督教聯會及協進會一起籌辦的。又最近聯會亦聯名反對同性戀合法化，這些都是大家一起合作的機會及例子。目前香港教會在合作上已經相當不錯，總比以往時多了。但在組織上合一，我相信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應該是努力的方向。

合一問題的再思



沈濟全

寫這篇文章或許是多餘的，因爲無論從理論角度或實際角度看，「合一」都是一個不易處理的問題。在教會圈子中五花八門的派系傳統，以及衆說紛紜的情況下，由一些還在學的大專學生去處理就更非易事。所以嚴格說，本文並無任何創新論點，只求從一較總括性的角度，將「合一」並其相關問題陳列，並加以一些個人反省及看法。

合一與分出

討論「合一」問題之先，更根本的問題就是爲何會有「合一」的觀念，簡單來說因爲這是聖經的信息和要求，在新約書卷中，這是個很重要的信息，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約翰福音十七章耶穌分離前的禱告中祝禱門徒們合而爲一，以及以弗所書四章第一至十節中保羅勸勉信徒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爲一的心。故此信徒之間應有合一見證這一事實基本上是肯定的。

然而爲何會有「合一」的問題呢？若繼續從聖經的角度看，便會發現另一個「分出」的觀念，若將兩個觀念放在一起時，理論上的問題便產生了。「分出」簡單來說就是從某些人中間分別出來，在新約書卷中這教訓也是十分明顯的，例如提後二：20－21，加一：8，及約貳9－11中指示信徒要從種種假信徒和假師傅中分出，另外林前五：9－11及啓二：2也有類似的教訓。「合一」及「分出」兩個觀念的對象也明顯地指向信徒羣中，於是問題就來了，究竟甚麽人是可以與之合一的，又甚麽人是要與之分出的呢？準則何在？「合一」是基督徒的目的和責任，而「分出」也是聖經對我們的鑑戒，這便構成一個兩難了。

誰是基督徒

從「合一」與「分出」的兩難中，必定推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就是究竟誰是基督徒？若然理念上這問題得到解決，我們便可以決定合一的對象，「合一」的問題於是得到解決。然而衆所週知，要爲基督徒下一個有效的定義以作概念上分別實在是個難題。《橄欖》曾於第三十八期刊出了「基督徒可否不相信神蹟？」一文，引起一陣子爭論，有人接納欣賞，有人疑惑，有人反對。就着對該文的論點的反應，經已顯示了十分分歧的態度和立場。這事實表示基督徒圈子中肯定對誰是基督徒這問題有紛紜的意見。

據筆者粗淺的觀察，對於合一對象的問題，基督徒圈子中起碼有五種態度。

(一)「普救論」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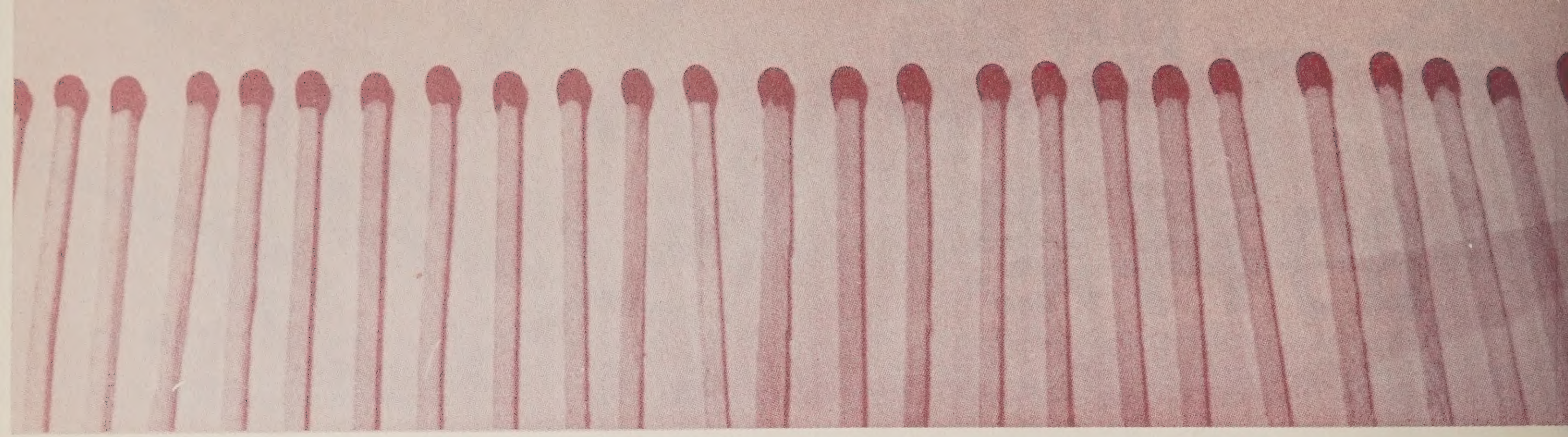
這是一種相信普世人類合一的態度，其基礎乃是一個普世得救的理論（註一），此看法可上溯至本世紀初的「社會福音派」神學（SOCIAL GOSPEL），強調建設一個地上的天國。因此，這派對於世界各大宗教均採取一個接納的態度，認爲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可產生一種相互批判催化的作用（註二）；行動方面，一些普世教會協進會的領袖以及天主教中盧加勒（CHIARA LUBICH）女士提倡的「普世博愛運動」就是明顯的例子（註三）。不過，持這類態度的人士在本港相信只是一個極少的少數。

(二)「普世派」的看法

「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的前領導人廖寶泉君在一個名叫香港大專基督徒神學研究雙日的聚會中曾宣稱他所理解的基督徒就是「凡認耶穌爲基督的人」（註四），這空泛及可以容許多種解說的說法與「福音派」人士的強調信條內容肯定不同。基於此，「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通訊中有所謂「教條使人分裂，事奉使人聯合」的口號（註五），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郭乃弘牧師也有「忘記大家的不同點，努力於共同的」的態度（註六）。總之，這派人士不拘泥於闡釋信仰內容，對凡自稱基督徒者都報以接納的態度。尋找「共同基礎」，爭取聯合的機會。或許馮煒文君所說「普世派」是自以爲仍在尋找眞理的基督徒的說法也可作個註腳（註七），正因爲不以爲擁有眞理，於是甘於背着問號，不輕言別人的對錯，於是在合一問題上也就顯得開放了。

(三)「福音派」的看法

「福音派」人士一般來說都比較重視教義，舉個例說，從一些「福音派」機構如突破、香港學生福音團契、中國神學研究院，甚至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都有其基本信約的事實中可見一斑（註八）；而在這些信條中，筆者認爲最根本的就是一個聖經



權威的教義，是作爲分別「福音派」與其他信仰立場，並賴之以建立其他教義的（註九）。因此，播道神學院院長鮑會園牧師有「在我認爲對的聖經標準上看，與我信仰生命相同的人，我才可以跟他合一。」的說法（註十）。而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滕近輝牧師在其《路標》一書中論及教會合一時也有以下一段說話：「如果宗派的名稱可以放棄，管理教會的方式可以放棄……但是基本信仰要義，例如贖罪之道也可以放棄麽？」這明顯是強調信仰立場的重要（註十一）。總括來說，「福音派」人士對合一對象是劃了一個頗明顯的範圍的。從信仰合一的層面上看，教義立場相同的強調便變得很重要；而從工作合作的層面上看，「福音派」則是開放的。亦由於「福音派」較重視學術和理性，故也採取較開明態度，容許對異己者的對話交流。

(四)基要派的態度

嚴格來說，「基要派」與「福音派」的信仰或神學立場上基本差別不大，主要差別還是在於兩者的氣質及對待異己者的態度上。所謂「基要主義」宣言源於一九一〇年美國出版的一套小叢書「基要信仰」（註十二），內容有五點，就是：聖經一字無誤；基督具神性，藉童女而生；替代性的救贖；基督肉身復活；基督肉身再來。觀塘喜樂堂負責人張樹一先生也明顯的強調類似的基要信條（註十三），很明顯，「基要派」爲基督徒所劃的範圍就更狹窄了。在這圈子以外的人，便報以「異端」，「新派」，「不信派」之類的稱號，而毋須與之作對話或瞭解。基本上，香港教會多承受了中國教會的傳統保守基要作風，特別是一些地方興起的福音堂之類，故此可以說大多數教會人士在合一問題上均是抱着一個保留，冷淡的態度的。

(五)一些邊緣勢力的態度

這是教會裏的一些新興勢力，就是一些走極端路線的，帶有靈恩色彩或被目爲「邪教」的教會。香港的教會與及一間位於旺角的九龍眞道教會便是好例子。筆者對這類教派認識不深，然而據觀察，他們似乎比起「基要派」人士對異己者採取更強排斥性的態度，似乎眞基督徒就是自己教會內的人而已。他們的保守排外態度除了他們自己的主觀因素外，客觀上，外面的教會人士不願意輕易接納他們也是一個因素。

在瀏覽過各種對合一對象問題的看法和態度後，筆者不能從一理論角度回答誰是眞基督徒　誰是合一的對象的問題。只能夠說，「分出」的強調到了極端，世上可能只得數個人夠資格與該信徒一起敬拜神，這從神愛世人，對普世教會均有其美意的角度看是不可思議的。若「合一」範圍的擴大到了極端，則基督徒這身份名號便會失去其獨特性，而變得沒有意義了。

會一的具體意思

在處理「合一」的問題時，另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就是澄清「合一」二字的意思，這兩個字在不同人士口中可能有不同含義。筆者觀察，一般人口中的「合一」有四種可能的意思。

(一)信仰立場上的合一

這是「福音派」或「基要派」人士所最爲強調的，在信仰立場上的合而爲一乃是其他層面合一的基礎。彼此信仰相同，才有同一的生命，那麽才可以共同參與在屬靈敬拜及交通等事情上（註十三）。對於一般「普世派」或推動教會合一運動的人士來說，這層面上的合一是不被強調的，原因是爲了尋找彼此共同基礎，謀求進一步合作相交，信仰立場的分歧將會成爲一個大障礙。並且在不以爲擁有眞理，背着問號做人的大前提下，彼此信仰內容不同自是可能，也不見得怎樣重要了。

(二)信徒生命相交上的合一

無論任何談及合一的人，也大都覺得信徒生命相交這層面上的合一就是最重要的。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幹事徐珍妮女士有以下的說話：「合一是叫衆人彼此嚐一下別人的菜，了解彼此味道不同之處，和其中之原委，有甚麽可以互相學習的地方，以致各人手上的餸菜都得到改良……」（註十四），意思大致也是強調信徒的互相接納相交，進而彼此幫助學習。這大概一定程度上代表「普世派」推行合一運動的意思。然而在「福音派」或「基要派」圈子中，正如前面說過，這層面的合一必須要建基於信仰立場的合一上，而異己者只可以停於對話階段。

(三)組織上的合一

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十年前循道公會及衛理公會聯合變成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又或如中國大陸現時的三自教會。相信現時鼓吹「教會合一運動」的人士或天主教所提倡的兩教合一運動是有這方

面的含意的。

㈣工作上，行動上的合一

這方面是現時香港教會發展的新趨勢。從一些超宗派的教會聯絡機構、福音機構以及神學院的設立可見這個趨勢。而且近年來，不同教會及信徒之間也多有參與聯合關社行動。從「普世派」人士的眼光看，這層面的合作自是值得大力推動。但在「福音派」圈子中，種種超宗派的機構也還需要納於一個共同神學立場中。而至於合作性的關社行動，他們未必就將它看成是一種信徒「合一」，而是任何人都可以一起合作的一些行動而已（註十五）。

對於四種不同的「合一」意義，筆者的意見是：第一是困難的，教義的分歧涉及種種歷史、文化發展的因素，雖然重要，但不宜過於高舉，以至動輒將人劃於圈外。對於第三種則基本上可能性不大，也不必要，因為今天的社會是一個結構複雜的社會，種種結構性因素加上歷史性發展令致教會有很多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存在形態。至於第二和第四種則是值得鼓勵的，而兩者也是相輔相成的，合一的第一步就是溝通和瞭解，互相幫助的行動更肯定是合一的見證。

實踐性的角度

討論至此，相信也可發現要以理論的角度來解決「合一」的問題實在困難。無論站在任何一個立場上，也可以發現與己不同者是那麽衆多。在信徒的圈子，事實上就是存在了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筆者覺得「合一」絕對不是一個抽空的理論問題，而是必須在具體現實中去處理的問題。當我們走向生活，願意以信仰來指導我們的生活方向，生活方式之時，我們如何去面對信徒圈子中五花八門，衆說紛紜的事實呢？我們又如何在生活中接納和理解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呢？在這意義上，「合一」就是一個實踐性的問題了。

筆者的起點是，人都是不完美的，基督徒更應淸楚這個事實，所以沒有人可以輕易看自己比別人強。而不完全的人在神眼中是寶貴的，是有尊嚴的，在神大愛之前，我們面對任何人包括信徒或非信徒，又或是敵人，也必須報以一個愛的態度，以諒解作為一切行動的起點。人因着有限與不完全，也基本上沒有人能完全理解眞理的，信仰立場重要是事實，然而也沒有人有資格輕易判斷弟兄，而這中間應是對話及諒解。

在今日的時空下，「合一」對教會來說乃是一個適切的問題。若然我們要共同面對九七對教會的挑戰；及在這個變遷急劇的社會中，要發揮一個整體性的有效見證，共同挑戰香港社會中的罪惡勢力，我們便不能再把自己關閉在溫室中孤芳自賞，以削弱了我們整體的能力。香港教會傳統下來的門戶主義不秋不睬的態度應要改變了，我們必須以一勇於實踐的態度來面對「合一」的挑戰。

正如文章開頭所言，本文並無任何創新見解。只希望在一番總結討論中，為不同意見的人帶來一點兒瞭解和溝通；也在香港教會面對前途問題之時，為教會和信徒間的合一作成一點推動作用，則筆者如願矣！

（註一）在本港，有關這理論可參黃祈思著，「人人得救!?」，《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通訊》1981 年 9 月 21 日。

（註二）關於這種講法可參廖寶泉著，「耶穌基督——異教信徒的生命？」《信息》1983 年 2 月。

（註三）關於普世教會協進會的提倡可參司徒焯正著，《近代神學七大路線》，1978，證道，第一四六頁。
至於天主教的「普世博愛運動」，在香港也有組織，稱為「新青」。有關其理論可參 CHIARA LUBICH,THAT ALL MAN BE ONE,1977,NEW CITY PRESS。

（註四）該次神學研討雙日舉行於 1982 年 2 月16 日及 2 月 20 日，主辦機構為香港專上學生福音團契，廖氏為其中一個分題「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的現況」的講者，他在演講中發表了他的講法。

（註五）見《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通訊》1982 年 3 月第八期。

（註六）見郭乃弘牧師的講話，載於本期內。

（註七）見馮煒文著，「福音派與普世派的屬靈氣質」《橄欖》三十期。

（註八）該些信約內容均載於該些機構的宣傳刊物內，大約內容包括三位一體神；聖經權威；全人類均有罪；耶穌基督是神亦人，對人類作了替代性之救贖；基督肉身復活、升天；罪人因信稱義；重生是聖靈的工作；聖靈運行於由眞信徒組成之獨一基督教會內；主耶穌在末日將親自再來。

（註九）相近意見者見張慕豈著，《近代福音信仰運動》1981 年宣道第三十頁。

（註十）見鮑會園牧師的訪問，載於今期。

（註十一）見滕近輝著，《路標》1971 年，宣道出版社。第一八五頁。

（註十二）見張慕皚著，《近代福音信仰運動》，1981 年宣道，第十六頁。

（註十三）見同期張樹一先生的訪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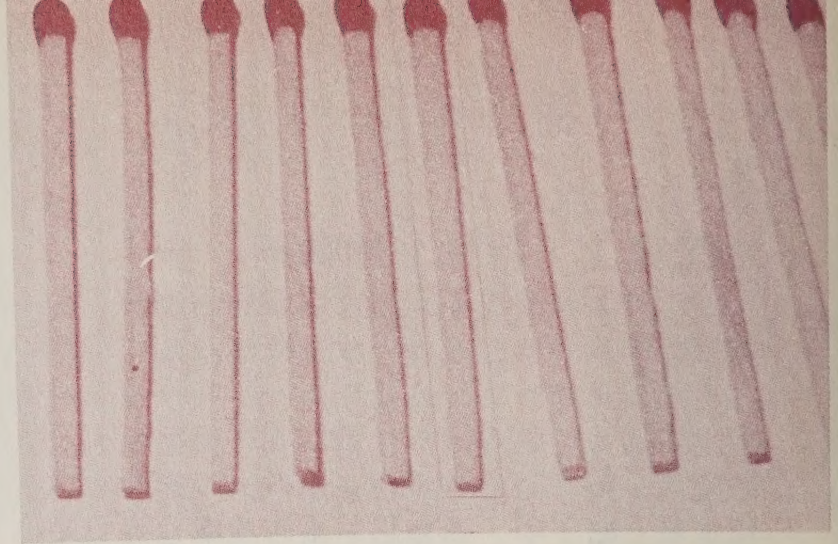
（註十四）見鮑會園牧師於同期的訪問。

（註十五）見徐珍妮著，「合一本身就是目的」《信息》1983 年 4 月。

（註十六）同註十二

合一補遺

陸錦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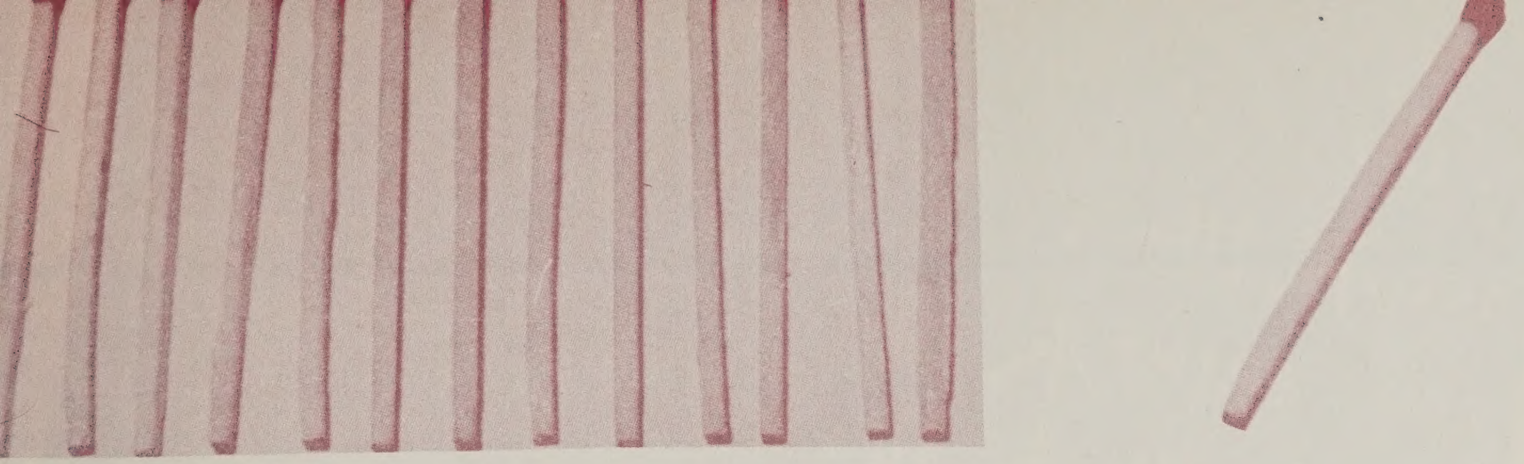
「合一」一詞於不同的人是具有不同的意義。對一位平信徒，這是聖經的教訓，是一幅和諧美麗的圖畫。而對神學院講師，教會領袖，或是堂會長執來說，它包含了不同的神學傳統和宗派源流。這些傳統和源流的相互關係和形成過程，使稍爲瞭解教會史的都明白：「合一」其實是代表了許多矛盾和衝突。相對於一位每星期返崇拜和團契，和弟兄姊妹有和諧關係的信徒來說，這名詞的含意實比經驗中要複雜得多。在香港，教會宗派林立，不同陣營的存在是無可置疑的事實，福音派和普世派的對立更加成爲一時的熱門話題。但它們的分歧與其說是神學，宗派和事功上的差異，不如說主要是意識型態上的對立。可見的事實是福音派的陣營中也有許多的社會參與和社會服務，不讓普世派專美；事功上的分別並非只有普世派做社關；福音派只傳福音。反過來說，普世派圈子中亦有信仰極保守，堅持基要信仰的人士。馮煒文先生亦曾自稱曾是一個SINCERE EVANGELICAL AT HEART。神學上的分歧似是較明顯的，但重要的是香港神學界似乎並未曾因任何神學課題而產生過正面衝突，從而導致陣營的分裂。筆者可以大膽的說：香港教會處事的成習許多時是非神學化（ATHEOLOGICD）的方式，神學陣營多是發揮一種標貼的作用，只叫當事者明白自己是在某一傳統之下，而對方是與自己的相反。人人都說自己的傳統是正統，是主流，而與我不相似的自然就是異端，是邪魔外道。在這種氣氛之下，陣營間的關係往往是政治性的（CHURCH POLITIC）。雖然實況是互不往還，但兩者之間是洋溢著互相不滿。你指責我將信仰關在四堵牆內；我又指責你偏離正道等等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但奇怪的是雙方都沒有去瞭解對方的變化和發展，以至去註釋對方的行動是多以一典型（（STEREOTYPE），多於從實況去理解對方的動機和目標。這種作法只有加深雙方的對壘心態，更甚的是以一些過時的，或籠統抽象的概括去指責對方。

按照專題小組的分析方法，理解香港教會的可以採取神學陣營，地方教會與翼鋒教會（PARA-CONCRCH），宗派傳統和九七問題四個角度。筆者以爲這幾個關係必須結合現況來理解，方可對香港教會面對的問題有一較動態的掌握。

香港的政治前途不單震撼了香港市民，亦爲教會提供了一共同的關注，爲宗派、陣營之間帶來了凝聚的力量。過往的互不往還，除了是意識型態上的對立和政治性分歧外，缺乏了客觀基礎促進彼此交流和對話亦是事實。現在教會整體不可逃避的與全香港市民面對同一命運，在可見的將來面對大陸的政權。教會無法再站立在社會的邊緣。如果她的存在要有意義，就必須站在廣大的草根階層，作爲香港市民的一份子，共同決定自己的命運，換言之，教會不可能保持超然的地位，介入和參與是肯定的。

關注和投入使大家踏上「在一起」的第一步，我相信更深的思想迫使我們反省教會對這城市的責任。傳福音和關社其實是TWO SIDE OF THE SAME COIN ，在廣闊的天國觀下二者是連成一體的：如果基督徒的使命是彰顯神的統治和主權，擴展祂的國度。伸張祂的公義、消除不平等和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就不必要和傳福音、使個人成爲基督徒、操練對神的敬虔產生矛盾；二者同時是彰顯祂的國度罷了。基督徒的關注應該是神國的特質在地上，在這城市中，在人心裏存在，因此香港的政治前途非單是不可逃避的使命，甚至香港人的民生狀況，民主制度，精神心態和主導文化等等都是基督徒要承擔的。假使我們認同這使命，緊接着的問題自然是教會需要更新！現時我們沒有條件去承受如此重的責任，無論在我們的承擔的心志上，在實際的關注九七行動上，都顯得緩慢和乏勁。最明顯的事例是外間的團體紛紛發表對九七立場意見書，組團訪問北京，中英談判進行的如火如荼之際，教會尚未有任何較實質的行動。我並不以爲「打先鋒」就一定好，但我們實在是太緩慢乏勁了。叫我們如何去面對神的使命，難道是等神使用外間的勢力去取代教會的功用嗎？

九七大限故然爲教會凝聚提供了第一步，但這不能掩蓋原有的分歧，原因是不同的神學傳統和宗派源流，在中國大陸政權臨近下，可能被刺激起更大的分裂。這是一股離散的力量，同樣是不可忽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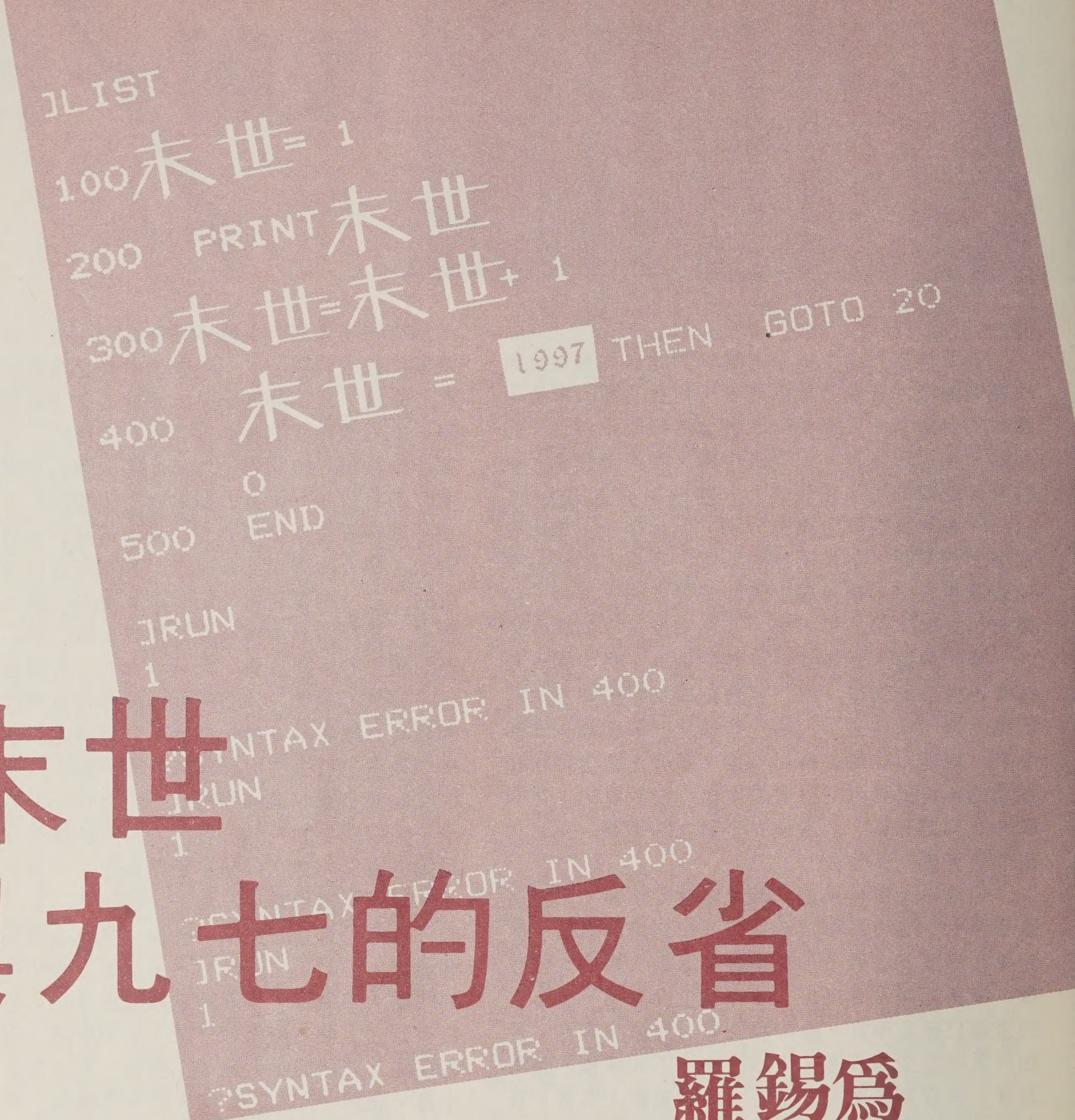
的。

香港神學界當下迫切考慮的問題自然是教會與政權的關係。在西方自由社會，教會有參政或是不參政的自由；所以無論持政教分離抑或政教合一的觀點，都可以生存。但是在中國大陸的社會裏，無論教會整體抑是基督徒個人，都無不介入政治的自由。在實踐程度上雖有分別，但起碼在主導統治意識型態下的，這是不抹的事實。香港的宗派與陣營間能否在這神學課題上達到某程度的一致性，尚屬未知之素。但無可否認，有相當多保守的教會和老一輩的傳道人是持政教分離的觀點，對中國政權採取不信任的態度，對三自會則視為宗教事務部的統戰工具。相比之下，另一些採取政教相輔相成觀點的，或是以中國政權爲可親，態度上完全信任和接受的，再或是以三自會爲中國合法教會的。都明顯的是背道而馳，這兩種完全對立的姿態，極之可能令雙方進一步分裂。

相信沒人能抨議這兩種立場誰是誰非，因爲這是牽涉到一個神學和政治現實互相交錯的課題。但起碼在態度上我們不可能再優柔寡斷。對於大陸政權，筆者的個人態度是：要害怕也沒有用，反正它的來臨已經是事實。除非我們有可能離開香港，否則與其抱着受苦心態，坐以待斃，不如積極的面對現實，看看有甚麽可以做的。而從現實上考實，在中國大陸的政權影響下，自然沒有西方式民主的「自由奔放」，但在規限中尋求活動空間，却是空全可能的。再面對香港現況，距離九七尙有十三年的時間，誰能預料在這段時間裏教會不可以有轉變更更新呢？

姿態上積極終歸還是姿態，不昧的事實是除了在實質行動上我們還是初步外；在神學基礎上的努力亦是花果飄零。回想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歷史，我們會驚覺的事實是基督教從未在中國生根。雖然基督教來華可追溯到大秦景教，但每一次都是以CONTACT開始，以 CONFLICT 告終。到近代，基督教憑着西方船堅砲利打入閉關自守的中國。但一方面因中國適逢巨變，基督教未能及時的闖出一條適合國情的路；另一方面，又因西方神學傳統的牽動，引發出一場社會福音和個人福音的爭辯，令到基督教對中國的貢獻，大打折扣。深切的反省迫使我們問：到底基督教如何才能成爲中國人的一部份？西方神學爭辯對中國基督教是禍是福？是在這些實實在在的問題下，本色神學被提出爲新的方向。對於香港，我們的問題是：到底怎樣的神學才能面對目前的政治和社會狀況？作爲中國的一部份（這並非願意與否的問題，而是必然面臨的事實），香港的基督教如何面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並不意味要完全揚棄西方的神學傳統只顧目前。事實上，西方的神學亦是因一些實實在在的挑戰而產生的：三一神論是由於福音信仰要傳入猶太敎的社會中，基督教必須解答耶穌和猶太教的耶和華之關係而誕生的神學教條、耶穌的神人二性論是希臘文化中物質，精神二元論的挑戰，基督教神學家必須回答擁有敗壞的身體的耶穌可以是神的問題、聖經批判是由於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所擢生的問題（亦因此而導致聖經權威的確立），到近代西方的樂觀人文主義破產令到人類心靈，入極大的虛無之中，保羅田立克立的存在神學遂應運而生。這些例子都指出神學是不能脫離了處境（ CON TEXT ）而存在的，沒有了實在的處境，神學只不過是學院裏的觀念遊戲，失却了它的活力。是民族立場和政治參與的問題，如果目前香港的處境要處理的，神學院或是有識之士便不能保殘守缺，必須朝這方向發展神學理論。在記憶中，除了中神在七九年出版了一本小書，題爲「初熟之果 聖經與本息神學」有兩篇探討本色神學的文章，香港的華人學者在這方面的努力似乎不多。直到近期崇基神學組出版的「一九九七與香港神學」，內載有楊牧谷博士的復和神學芻議，這都顯示出香港教會有人向這方面做功夫。以目前的形勢，這實在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儘管在「合一」的問題是有凝聚和分散兩股力量在互相制衡。但在可見的將來，福音派與普世派之間有更多的交流和溝通是相當肯定的。如果這些交往能從討論未來大勢，進到事功或服務，再進到神學的領域，實是令人鼓舞的。至於其他不能或不想凝聚在一起，只要不是苟且偷安或走的走，散的散，我們何必介懷他是福音派，基要派或是普世派，他是關社或是傳福音呢？無論如何只要神的國度因他而傳開不就成了嗎？事實上，在目前的條件下，「合一」的可能性是相當低的，既然宗派陣營存在已是概成事實，教會將注意力放在使命上應是更適切的了，因爲等着做的事功正多着呢。



末世與九七的反省

羅錫爲

對很多基督徒而言(甚至非基督徒也是),九七的大限就是他們的「末日」。對我們一群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徒大專學生和知識份子而言,九七也是我們的「末日」嗎?究竟「末世」是甚麼意思?九七的問題是不是能夠給我們一些神學的反省呢?

末世的分界—基督

末世論,自二十世紀開始,一直是神學探討的焦點,新約聖經的學者和神學家們都以爲末世論應該是基督教神學的起點而不是終點。基督的教訓,初期教會的宣講,都是以末世爲背景的,以致巴特在「羅馬書註釋」一書中強調:「如果基督教不是徹首徹尾的末世論,所餘的也是與基督教拉不上任何關係的了。」(註一)巴特的說法一點也沒有過火。從史懷惻.威斯(JOHANNES WEISS)等開始,以至ERNST BENZ,JURGEN MOLT-MANN,WOLFHART PANNERBERG,和天主教的神學家如JOHANNES METZ,KARL RAHN-ER,TELLIARD DE CHARDIN,E.SCHIL-LEBECK 等,無不認爲末世是瞭解這個世界歷史,啓示、信心和盼望的根據。不是新約信仰的課題之一,而是其主題。

「末世」很容易與「來世」混爲一談。末世當然包括了將來必成的事——主再來、來生、復活、審判、新天地等事情,這些也是我們的盼望。但末世的分水嶺不是基督的「再來」而是祂「本身」道成肉身、介入人類的時空歷史及至死而復活的事件

(註二)。上帝的王權，已經藉基督的降世、受死和復活來到了。正如陶德(C.H.DODD)所說的，末世已經「實現」在「基督的事件」(CHRIST-EVENT)，所以稱之爲「實現末世論」(REALIZED ESCHATOLOGY)。但是上帝的國度「已經」實現了，却「尚未」完全實現，因爲這個世界，舊的時代，要被一個新的世界、新的時代所取代，所以我們仍然在等候一個新天新地，仍然禱告說：「願你的國降臨」。舊的世界正在「淡出」，新的世界正在「淡入」，而我們身處在這兩個正在交替的時代之間。活在「已經」實現在我們身上的上帝的主權之下，但是仍然盼望那「尚未」來臨，却會隨時來臨的時代——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復活更新的榮耀的日子。

未來的希望

如果我們沒有給現代人把錯脈的話，現代人的「病徵」是「焦慮」，病因是「沒有希望」。法國的現象學家PAUL RICOEUR 探討人類存在的負面問題是：有限性、罪疚、苦難、錯誤、會犯錯誤……而JACQUES ELLUL在 HOPE IN THE TIME OF ABANDONMENT 一書更詳爲現代人斷證，指出現代人不是缺乏「信仰」和「愛」，而是落在一種「被遺棄」的處境而失去希望。(註二)人類會有前途嗎？會有希望嗎？「未來學」(FUTUROLOGY)因此應運而生。我們身爲中國人，也在爲自己尋找未來。馬克斯主義說：「哲學家們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釋世界，但重要的是，去改變世界」。儒家的人文主義說：「法先王」，美好的將要是回復到「原本」的「理想人格」之中。基督徒能怎樣，康德在純理智批判一書提出的第三個有關理智的問題：「我可以希望些什麽？」芝加哥信義神學院的系統神學教授在THE FUTURE OF GOD一書中，比較俗世的「未來學」和基督教的末世論。他說:「俗世的未來學的未來是由世界的『演變』(BECOMING)的進程而『達致』的。基督教末世論的未來是由上帝國的『來臨』(COMING)而『達到』的」。(註三)上帝國的COMING是世界的BECOMING的基礎。基督徒末世的盼望能給這個「遭遺棄的時代」什麽希望？這是值得我們反省和再反省的。

在「兩個時代中間」的香港基督徒

另外一個要反省的問題，就是九七的問題。九七也是個「末世論」的問題，關乎兩個時代：九七之後和九七之前的緊張狀態。香港人就是處在這兩個時代的過渡期或者是夾縫之中。或許我們都希望到那個時候，一切的現狀不變、制度不變。到時變也好、不變也好；大變也好、小變也好，我們肯定要面對一個審判。香港保持資本主義是對共產主義的一個審判？或是資本主義要受到共產主義的審判？我們的信仰也要受到「審判」，「審判要從上帝的家開始」！而我們的信仰也要審判一切的政治制度。我們的義能否／是否勝過「資本主義」的義？「共產主義」的義？一切都要從現在做起(如果從前沒有做到的話)！十四年的限期瞬卽流逝，中國近了！我們何時作好準備？在我看來，上帝的國比中國更近，上帝的國沒有限期，隨時可以降臨。教會作爲一個末世性的群體，其盼望不在這個世界的演變，而是在上帝國的降臨，我們能活出了我們的希望——眞正的希望，甚至可以藉殉道而血證的希望嗎？

我們要作些什麽準備呢？候主再來的準備與爲九七的準備有什麽相同嗎？馬丁路德說：假如基督明天回來，今天我也會種一棵蘋果樹。」希望的先知耶利米對被擄到巴比倫的同胞傳的信息，對我們有甚麽意義？(耶29:5-7)或許，我們需要先反省主再來的問題，然後可能夠面對九七的衝擊。

註一：
Karl Barth, the Epistles to the Romans, tr. by Edwyn C. Hosky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314
註二：
參 Jacques Ellul, Hope in Time of Abandonment, tr. by C. Edward Hopkin, (Seabury Press.1973)
Carl F. Braateen, The Future of God.(Harper & Row 1969) PP 29-30

皈主・蒙召・遠東・神學教育

四重呼召的趙天恩牧師

皈主・蒙召・遠東・神學教育

採訪組
整理：朱惠兒



八二年，趙天恩牧師出席《橄欖》有關九七問題內部學習座談會作演講。

編者按

曾經有人說，每塊落葉背後都有一個故事，而人的成長與思想，亦當然經過許許多多的體驗與教育而成。今期介紹的趙天恩牧師當然也不例外。偏執與開放很多時是相對性的用詞，也許在保守教會長大的你，會覺得趙牧師太過開放，而慣於政治、意識型態反省的他，又會覺得趙牧師太過一面倒。但容讓當事人先說他的看法，然後透過思考體歷作評價才是認識一個人的正確方法。

有些人或許批評《橄欖》太多開放理性的思想問題而少有勵志激情，其實，這一方面是嘗試溶和一下教會圈子中過多的情緒式瞭解事物的習慣，另外亦希望讀者能透過一些人切膚而發的言論，從新的角度看何謂「委身」，當一班人獻上一生從事參予社會服務、教會研究……等工作時，我們又豈會無動於衷。

假如你經常閱讀《中國與教會》，相信你對趙天恩的名字不會感到陌生，他除了是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的主任及主編《中國與教會》外，並於中國神學研究院（中神）任教。是次特地來到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希望能對這位投身於中國教會研究的趙牧師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

> 親國民黨的說我們親左，三自卻說我們親右。其實，我們是站在一個中間位置，以基督徒的立場來分析時務，爲教會的需要，傳福音的需要，並非政治性的。

問：趙牧師，可否簡述你投身中國教會問題的思想歷程？

答：「我爸爸是位牧師，當共產黨未完全佔領東北時，我們已離開中國的遼寧省，先後到過廣州及香港，其後去了日本居住。我一直在教會中長大，但清楚得救重生是在十四歲那年。那時（約一九五三年），我正在日本唸中學，神很清楚呼召我傳道，我感到人生最有價值的投資就是將生命交給主，被主所用，於是我決定獻身給主。中學畢業後次年，我們舉家移民往美國。我在美國唸大學，目的是準備將來攻讀神學，我選修希臘文和拉丁文，以幫助研究聖經及哲學。大學畢業後便去了威氏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唸神學，在那裏得到非常好的神學教育，特別是系統神學。對我而言，唸神學的時間是我一生中最享受的一段時間，神的眞理

和救恩這樣奇妙，我既知道這件好東西，加上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自然而然想到中國教會的需要，於是我一直希望完成這三年神學課程後回到遠東來事奉神。可是，當我唸二年級時，神的靈激勵我回到遠東來，在一九六四年我決定停學一年，到遠東來看看。在朋友的介紹下，我到台灣一間基督書院教希臘文及拉丁文。在那一年，我到處去旅遊和講道，並發覺台灣的神學教育水平很低，傳道人往往無法回答大專生所提出的理性問題，加上他們的神學基礎與我們聖經的信仰有所差異，而所謂「新派」在台灣也開始有了影響力。

「一九六五年我和太太結婚後，再回美國唸神學三年級，但心中一直希望在遠東能有一所中國教會本色的神學院，是為大專生預備的，使傳道人的水準能夠提高，因假如神學生基本教育不夠，對社會問題及歷史問題不了解，對社會變遷便沒法子分析，所以我有一個負擔去建立一所中國本色的神學院，特別為大專畢業生而設，信仰方面是福音派，另外對於所謂「新派」或「自由派」的神學能有所對應，能為聖經眞理作見證，這是從一種護教學的心理引發起的。我開始在美國推廣這異象，與陳濟民等人在費城發起一個中國神學生的團契，鼓勵他們好好讀書，回到遠東來，可是大半當時的神學生均沒心回到遠東來。由一九六五年開始推動，至一九七五年中神成立，這十年內，我的時間主要是投入這個建立中神的事上。

「在神學院畢業後，我再讀一年GRADUATE SCHOOL，那時我極有興趣發展本色神學，但對中國沒有深入的認識，因自小在外國長大，對中國歷史不清楚，因此決心修讀漢學。因為讀了中國研究，又有神學背境，在七〇年開始，美國和歐洲的宣教機構舉辦的中國宣教研討會議常邀請我參加，在準備講稿的過程中，我開始思想教會在共產中國的問題及傳福音等。另一方面，我的論文是《二十年代中國本色教會的發展》，故我對如何建立中國本色教會很有負擔。所以，總的來說，第一，我現在的參與是投身在傳福音的呼召上，第二，神呼召我回遠東，第三，神呼召我投入中國神學教育，就是通過我的背境和神的帶領，叫我對大陸教會的研究發生興趣，並且得到了托負。

問：那麽，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是如何成立的呢？

答：中神在一九七五年成立，但當時我在美國寫論文，加上身體不大好，到七七年才回港，開始在中神任職教務主任。我剛回來，發覺大陸局勢開始變動，而且變得很快，如打倒四人幫、四個現代化等，所以我覺得應該特別留意和研究，加上在回港之前，我已計劃為中神開設一所研究中心，研究教會歷史、宣教學及推動向大陸傳福音的異象，故我一回港就致力籌備這所研究中心。到七八年七月，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目的有三：第一，研究中國大陸教會的情形及發展的問題；第二，對中國教會的歷史作一個長久性的研究；第三，研究中國華人教會的差傳工作。但因為大陸迅速變化，而外面對其了解要求也很大，所以我們的重點就放在中國大陸教會的研究，到現在也是如此。至於中國教會歷史研究，亦於去年開始了。

「從七八年至八〇年，研究中心是中神的研究部門，但我們發展特別快，人數由開始時的四人增至十人，中神因地方有限，故沒有地方可供發展之用。另一方面，我們的預算愈來愈龐大，但又很有伸縮性的，故很難和傳統大機構的預算計劃吻合，因此在行政上，我們感到不大方便。此外，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國與教會》受到很多人的非議。親國民黨的說我們親左，三自却說我們親右。其實，我們是站在一個中間的位置，以基督徒的立場來分析時務，為教會的需要、傳福音的需要作出分析，並非政治性的。雖然如此，這種風波始終對中神不利，所以就決定讓研究中心獨立。我自己仍然在中神任教，但只是PART-TIME教中國教會歷史，由八〇年八月開始，全時間主持這個研究中心。因此研究中心的創立，一方面是我個人在過去對中國的關懷，特別是傳福音的關懷，另一方面是因為打倒四人幫之後環境造成的，海外華人教會需要有人從事中國的研究和分析。研究中心成立至今已有五年了，基本上是從歷史角度去研究中共宗教政策及其對中國教會的影響，再從神學及宣教角度看教會的發展及其對中國前途的影響。」



圖爲趙天恩牧師主編的《中國與教會》雙月刊。

問：發展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時，香港是否已經有類似的研究中心？在香港這個小地方，有這許多同性質的研究會不會重覆？

答：我們未開始之前，福音證主協會已開始了四年，香港雖有這許多同類型的機構，但立場各有不同，道風山對中國的看法和對三自的態度是認同的，但我覺得我們不能隨便對大陸政治認同，對三自也只能客觀地觀察，沒必要採取認同。此外，各機構的工作重點亦有所差異，證主協會的重點是文字工作，遠東廣播和環球廣播的重點是廣播，亞協的工作範圍則較廣泛，而我們的重點是研究工作，各機構的工作重點雖然不同，却好像肢體一般互相配合。

問：你覺得這些機構對香港前途有何意義？特別是倘若中國一旦收回香港，這些機構可能不會再存在，但現在花了許多人力、物力去發展，會否是一個浪費？

答：這些機構是爲服事教會而設立，它們的存在和香港教會的使命與存在是相依爲命的，它們的存在不但不是浪費，反而是不可缺乏的。對於一九九七問題，這些機構更有作用，它們把研究資料和意見帶給教會，成爲資料的提供者，引起教會作出應有的反應。然而，從事中國變化、歷史問題以及學術問題研究的人手仍然缺乏。

問：趙牧師，不知你對中國教會的看法又如何？你曾經發表過關於中國教會的分裂論，但不久前有代表團來港作交流，不知道對你的看法有沒有影響？

答：分裂論你要看是誰說的，假如是丁光訓等三自領導人說的，我也不知道他說的分裂是甚麽意思。原則上，三自的立場就是要將全中國的基督徒拉在三自的大傘子之下，跟三自走，這就是合一。而黨的宗教政策是給宗教活動一個範圍，在此之內有自由，目的是希望製造一個社會環境，使宗教可以自生自滅，這是黨的用心，三自就根據黨的意思執行。家庭教會也是信耶穌的人，對主忠心，但在傳福音的事上順從神，不順從三自，於是三自和公安局就向他們施壓力，因此就發生衝突。家庭教會對傳福音及對三自的看法我們有報導，三自開會及動態我們也有報導，兩者均有介紹，這才能成爲一個客觀的研究中心。可是，這樣就引起三自不滿，認爲我在搞教會分裂。所以如果你採取客觀的角度來研究大陸問題，而不全心支持三自，他就說你分裂中國教會，你說是我分裂中國教會，還是三自分裂中國教會呢？如果三自眞是爲教會的利益，就應給人自由去傳福音。那麽所有人都會支持而不會反對三自了。關鍵在於教會的事是應按基督的旨意行，還是按政府的意思行；誰是教會的頭呢？

問：那你是不是隨時準備離開香港？

答：我雖不以爲然，但也不能肯定。到現在爲止，香港仍受英國管理，到一九九七，假如中共眞的發命令不讓我留在香港，那我也沒辦法，只能離開。但在此之前，文教界、宗教界應該充份利用現有的自由，而且爭取以後的自由。但我認爲中共不一定會在香港展開對宗教界的鬥爭，因這對香港保持經濟穩定不利，故前面仍有很多未知之數，其中一個可能是在這十多年內，大陸內部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起了變化，說不定會離開馬列主義，變成一個半資本主義的中國本色的社會主義，因爲很多人都發現蘇聯的一套在中國使不得，搞了六十年，愈弄愈糟，這都是西方社會主義弄成的。所以要滿足中國富強和四化的目的，成爲世界大同，中國一定要改，此外，中國近代歷史的趨勢，文革新一代的追求，和留學生回國後的要求，都會導致未來的改革，另一方面，中國現有信徒差不多達五千萬，這只不過是百分之五的人口，再過十多年，可能會到一、二億，就是說基督徒逐漸增加，已開始影響中國的思想及前途。

問：據說內地的家庭教會很倚靠神蹟奇事，這會否很危險，容易有神棍，異端的興起？

答：有少部份的確在教會的復興中走上了異端，但大多家庭教會都是清楚信主的，而他們的傳道人對救恩、傳道、教會的方向都很清楚，有的更有訓練，各地區都有同工會。其實，有神蹟並不表示行邪教，當有人逼迫基督徒，神就藉神蹟來彰顯祂的名及祂的眞實。家庭教會也知

道他們中間有異教人，假如他們不聽從勸喻，便把他們開除，並致函其他地方的家庭教會不要接納這等異教人，故家庭教會的組織和紀律十分嚴密。

問：你對家庭教會的神學基礎有甚麽意見呢？對大陸新興的和解神學又有何看法呢？

答：家庭教會的神學基礎很簡單，以新約的基本福音爲基礎，相信耶穌的道成肉身、死、復活和升天，信聖父、聖子、聖靈、傳福音等，這與香港教會所信的差不多。在三自教會當中，他們發展「和解神學」，主要與南京神學院的陳澤民爲代表，「和解神學」基本上是統戰的神學化身，中共家庭政策目的是要推動統戰，把信和不信的人拉在一起，合而爲一，建設四個現代化。他們通過道成肉身的宇宙的基督（THE COSMIC INCARNATE CHRIST），使救贖歷史和普通歷史間的分別得以消除，使二者合而爲一，道成肉身好像是圓形的神學體系，有神與人的兩個中心點，神與人慢慢成爲一，成爲一個圓形，以基督爲中心點，以社會爲圓，因此沒有信與不信的分別，使信與不信完全沒有隔閡。

問：總括而言，你認爲其中統戰味道很濃？

答：不單很濃，簡直是通過神學的思想來推動及發展統戰的觀念，所以我們可以稱之爲「統戰神學」。他們希望如此基督徒可參與社會主義建設，中國人對基督教的看法就不是「洋教」，基督徒也不看中國人爲不信，要去使他們成爲信徒。他們反對傳統的「領人歸主」，而注重基督徒在自己的工作崗位和生活環境下作光作鹽，其實中共不希望多人信主，故三自一直將大陸信主人數壓低至一、二百萬，如果他們承認中國有更多的基督徒，就是證明中共宗教政策失敗，因爲其目的是要縮減人數，所以三自特別反對 CONVERSION PRINCIPLE，教會的使命是作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和解。另外，人和神之間也有和解，但這不是通過耶穌的死、復活和升天，乃是通過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而完成人神之間的和解。換言之，是通過社會主義而達成，故這套神學經不起聖經學術的考驗，不合乎聖經，只是利用聖經名詞和神學觀念來發揮統戰思想。

問：另外一個問題是關於宗派，三自宣言中國只有一個教會，但又有說宗派在大陸仍有很大的影響力，你認爲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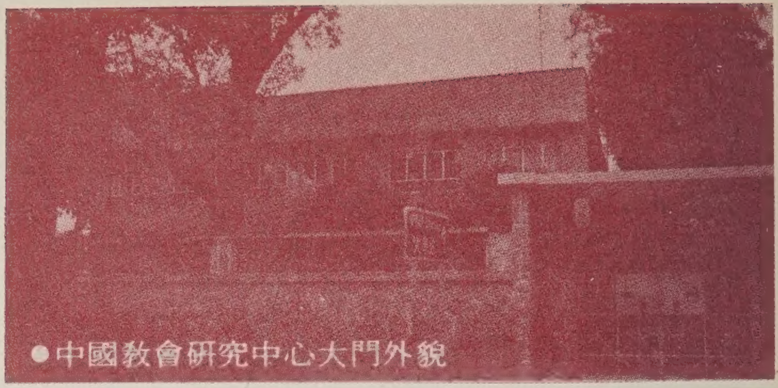
答：其實，大陸的宗派到一九五四、五五年已完全被三自拆毀，到一九五八年，所有公開教會都是得到三自批准的，故宗派在中國已不復存在。到了六六年文革時連三自也被摧毀了，統戰部、宗教事務部、三自愛國會等組織完全冲掉了，三自到一九七九年八月才開始恢復。然而，三自仍要強調是反對宗派，原因是反對海外的宗派人士回到大陸和以前的人拉關係。到現在爲止，三自很想切斷海外和內地的聯系，所以不歡迎外人，他們強調向中國傳福音的主權在中國，而事實上也沒甚麽宗派要回到中國重建甚麽宗派教會。

問：但宗派思想在家庭教會或三自中是否有影響力？

答：三自本來是無宗派思想的，只是利用宗派而已。例如丁光訓以前是屬聖公會的，一九五四年在三自的指示下被封任爲主教，照他所言，現既無宗派，他便不應自稱「主教」，但他仍以聖公會主教的身份，來香港及去英國與聖公會聯絡，主要是通過宗派來發揮他的作用。

問：聽你說來，你似乎對共產黨、三自等的態度都很保留，其實你有沒有反對共產黨的傾向？

答：我對任何政治黨派都有保留，就是對教會內的宗派主義也有保留，我沒有傾向將研究中心變成一個政治勢力。以基督徒的立場而言，我當然不能接受共產主義的無神論。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發展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現象，我在香港作爲一個研究工作人員，沒有必要去反對它，它的興旺有其歷史原因，而來日它的變化亦有其內在原因，不需要我們去反對。但我相信基督教在中國是不會被消滅的，因爲信仰裏面有生命，是神賜予的。假如中國共產黨眞的爲中國人着想，也許會生存下去，如果繼續是獨裁家，相信很難得到民衆的支持。



●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大門外貌

問：你覺得基督徒參政有沒有可能？特別是在一個極權國家中？

答：在共產政權之下，基督徒原則上都要順服政府，政府的功能是秉公行義，但假如一個政府不秉公行義，它遲早會得到神的審判，權柄要從它手中拿去。但聖經沒指示我們用武力反對政府，基督徒原則上應代教會負起先知的角色參政，表示政論，爲公義講話，或許是要付代價的，但歷代都有人爲公義講話而付上代價，甚至非基督徒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以個人公民身份，如果有可能應該參政，如香港可透過選舉參政，但在大陸，基督徒的身份不能入黨，非黨員是很難參政的，這實在是不大公平。

問：現在民主運動有起有落，你覺得是否一個改革力量？

答：民主運動可代表文革一代人士對中國前途關懷的表現，中國歷代均有一批知識份子在國家興亡時挺身而出說公正話，如康有爲、梁啓超、孫中山等，他們要付上大的代價，所以我看他們是從中國青年知識份子愛國表現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愛國表現會給中國帶來變化。

問：那你認爲會否有影響？

答：影響是有的，但現在是隱藏着，因他們沒有多大機會發揮。最近在美國出版的《中國之春》就是在中國不能開花，因此轉向美國去。以中國的形勢而言，第一批革命家如毛澤東已有部份死了，第二代如胡耀邦、趙紫陽再過十五年左右也會在歷史中消失，文革一代的人也快要上台了，我認爲他們會將中國帶到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的路上，這條路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趨勢，誰也不能阻止。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香港未到一九九七前，大陸已開始變了，大陸有新的變化，對香港很有利，可能會保持高度民主的傳統。

問：對經濟方面如四化、五年計劃等，你有何看法？

答：經濟方面我沒有詳細分析，問題是實行了集體制的中央經濟措施，再加上「大躍進」之後的集體統治已成了定型，現在要在行政、制度方面改革是很困難的，但也正在改革，如在鄉間的包產到戶和城市裏的私人生意等都是好現象。其實，鄧小平的經濟路線是中間偏右的，中共中央正希望能將已僵化的社會主義經濟改變成能汲取資本主義的好處，但當然不能太快，因中國人口太多，中國政府也知道社會主義有它的問題，但在社會主義原則下，最低限度能維持民生的保障，不會造成人民基本生活上的大危機。

問：你對共產黨的看法頗樂觀，但官僚主義的流毒似乎相當大，根本可能是制度上沒法做到，你覺得這說法如何？

答：我對共產不是太樂觀，但是我對中國民族的更新性是很樂觀的。對中共經濟發展的問題，我們需要忍耐些，不要肆意批評。我們都希望中國的前途越變越好。至於官僚主義，不是共產黨時代開始的，是中國歷代傳統的遺產。封建制度是「人治」而非「法治」的結果。基本上，在中國根本還未建立起來，而儒家留下的人治遺風甚重，所以很難客觀地建立一個法治行政制度。整個行政制度就給一大串的人際關係綁住，所以很難改革，要改的不但是制度而且是人，故此這是一個大問題。

問：很多人說鄧小平若死了，不容易有人能抓着政權，言則，對共產黨而言，當眞不樂觀了！

答：他死了會怎樣的亂我不知道，但根據共產黨的制度，必能產生一人或集體領導的。但是因人際關係問題，穩定新政權又要一段時間。故中國前途對很多研究者而言，還是問題重重。我們從基督徒的角度看，只有福音能救中國，因福音能帶給人整套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人之上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就是聖經的標準。所以對中國來說，如果有更多人信主，基督教思想能慢慢影響中國的知識份子，將馬列思想或中國傳統思想慢慢基督化，才能建立一套站立得住的民主法制觀念。因此，中國的前途在於她能否接受神的救贖和旨意，而所有基督徒應努力推動福音工作，將神學的觀念介紹進中國。中國的福音化和基督化應是整個民族前途的希望！

三家茶

救救導師

周華山

一個近年來頗爲嚴重的現象——少年團契和中學學校團契日漸衰落，很多教會的少年團均由三、四十人降至十多人甚至更少，少年團契福音營更是舉步爲難，如何傳福音給少年人固屬千頭萬緒，如何維繫已有的一班團友更令人費索思量，是這班十二至十六歲的罪惡滔天，還是團契內容流於陳腔濫調，總之，他們對講道和查經均嗤之以鼻，尤其要他嚴肅和沉默的聽一小時道。事實上，很多少年人直言他們返團契純粹因爲有一班死黨，可以蹉跎歲月，反正週末也是空閒，但當這班朋友離開團契時，他們也會步其後塵，如何適切地向少年人傳福音正是我們要立即面對的問題。

人總希望別人接納並採用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少年工作者如教師和導師也很容易以他們的價值取向套用於少年人身上，他們甚至有一種「理想」「典型」「標準」的基督徒模式，例如行爲端正，勤力讀書，待人有禮，多返聚會，勤讀聖經，不應喧嘩，不應看黃玉郎、龍虎門、明週等，不應打機（遊戲機），不應開P（舞會）……這些導師和教師均希望撥亂反正，帶領迷途小羔羊離開使人犯罪、跌倒的地方，使他們重歸正途，彷彿當他們做足了一些又逃避了那些就算是委身的基督徒。

任何群體都有其本身獨有的次文化，甚至基督徒也有一套外星語言，例如「交通」「求主開我的心」「事奉」「屬靈書籍」「人的破碎」「保守帶領」等等，同樣的，少年人也有他們的次文化和語言，如「泡」「正」「打機」「過癮」「撈」……正如成年人喜歡打壁球，網球，少年則喜歡打機，三五成群在街上流連，看公仔書，並非任何事均是相對的，但把自己的一套次文化加諸在別人身上是無意義的，只教他們做這些，不做那些未必可以幫助他們活潑的實踐信仰，但太多時候，我們只責罵他們打機，而不同在現有制度下，一班明知過不了中三試的初中學生，放學後可以往那裏去，難道叫他們去圖書館？或者我們斥責他們不返教會？但我們却不去問現有的一般主日學課本和團契模式和他們的生活有什麽關係。最近，筆者有機會問一班少年團友他們最欣賞的三個人物，在三十多人中，無人答父母，却有十多人選中森明菜，其他多爲劉德華，周潤發等，成年人很容易變得很道德主義，即常斥責別種文化和群體，但却不了解這個文化的成因，正如披頭四初出道也觸怒衛道之士，甚至被形容爲貪圖逸樂，道德淪亡，利慾薰心等。

福音的大能是跨越文化、年齡和時空的限制，但在這個時代，如何把福音適切的傳給現代的少年人却是要立時面對的課題，本文只是一個引子，背後還有無數的枷鎖要我們面對；最理想的少年團契模式和內容應當如何？主日學課本是否已經脫節？少年團導師是否需要接受多方面訓練？導師認識團友嗎？現代少年人的心態是如何呢？………對少年工作者一個小小的提議，你嘗過連續打機一小時的樂趣嗎？還是這是你的禁區，中森明菜你認識嗎？還時你對日本熱一曉不通，龍虎門你看過嗎？還是你以爲這根本就是罪。

（本文作者爲港大同學。）

基督徒姊妹與髮型屋

天藍

最近，因爲一個非常熟識的親友結婚，所以索性去理髮店梳理頭髮。由於光顧不勤，沒有固定的理髮地方，當要選擇理髮的去處時，引起我一連串的感想。

在香港，理髮店可說是蓬勃而方興未艾的生意，由古稱理髮店到髮型屋、髮廊、髮舍，琳瑯滿目，令人眼花撩亂，新型的門面裝飾和設計象徵着時尚的趨勢。這使我聯想到名牌、房車、玩相機、供樓一系列的時尙潮流，最重要的是這些潮流背後代表着一種價值觀——人的價值建之在他所擁有的物質上，這個違反基督徒精神的價值使我望而却步。

最後我選擇了一間價錢比較合理而又不會太落後的理髮店。其實基督徒姊妹應當如何留心理髮與信仰實質的問題（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却蠻有意思。）到髮型屋理髮，我們是正在運用許多上帝托管我們的東西：主要是金錢和時間，恤髮還好，要電髮一坐就要坐上三個小時，如果常常到髮型屋，是否把生命大部份時間浪費在可戀棧的虛榮上？再談金錢之昂貴，不用贅述，我們怎樣作神的好管家？況且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接受人這樣週到的服侍，是不是違反基督精神呢？縱觀教會的姊妹，經常都把頭髮恤得整潔怡人，師母也常常化妝，穿著最時尙的衣服，這已經不是使用「髮滌」的時代了，我內心有更多矛盾。我不是提倡法利

賽的禁慾主義，不過正當理髮在教會普遍被接納和認可的情況底下却同時有以上種種可能違背基督精神（或簡樸生活精神）的地方，才令我內心忐忑不安。

上述是我一方面的反省，另方面是髮型屋的理髮員，他們分師傅和學師仔兩級，不過，細心觀察底下，他們擁有一種共有嗜好，言語和生活文化，過去，他們大多學業不成，被鄙視爲洗頭仔，當髮型日漸被重視時，尖沙咀一些訓練理髮員的地方爲這群謀生人仕提高專業身價，也成爲一些讀書不成，愛慕時髦的年青人投身的「事業」。在新型髮型屋裡，你隨時可以找到頭髮捲曲，穿夏威夷花恤，手臂有小小紋身，閒來抽兩口煙，愛好HI-FI和流行歌的「後生仔」，正正是一些我遇見過,無心向學，快要被踢出校門的學生底翻板，（可能由於我是學校社工的緣故，得以接納他們的生活遭遇和家庭、學校背景），他們不甘於工廠的刻板生活，又不能在正途的社會階梯攀升，却愛務正業，這個理髮行業無疑對他們有很大的吸引力。年輕人開髮型屋取代舊有的上海理髮師，是否暗示一個悲涼的社會現實？這群人不被社會正途規範所接納，又不甘於平庸刻板，需要實現自己，創一點事業，這種自尊使我尊敬，可是，誰又去眞正體會他們生命的需要和接觸這個階層的人呢？他們有血有肉有靈性，按上帝形象所做，我在夢想一些經常去理髮店的姊妹可不可以花兩、三小時與理髮師傳談生活、談人生，以及傳揚福音。教師，護士、律師，警察團契部在紛紛成立，何時有人去成立一個「洗頭仔團契」、「髮型師團契」？

（本文作者爲港大畢業生，現職學校社會工作者。）

別走極端

華新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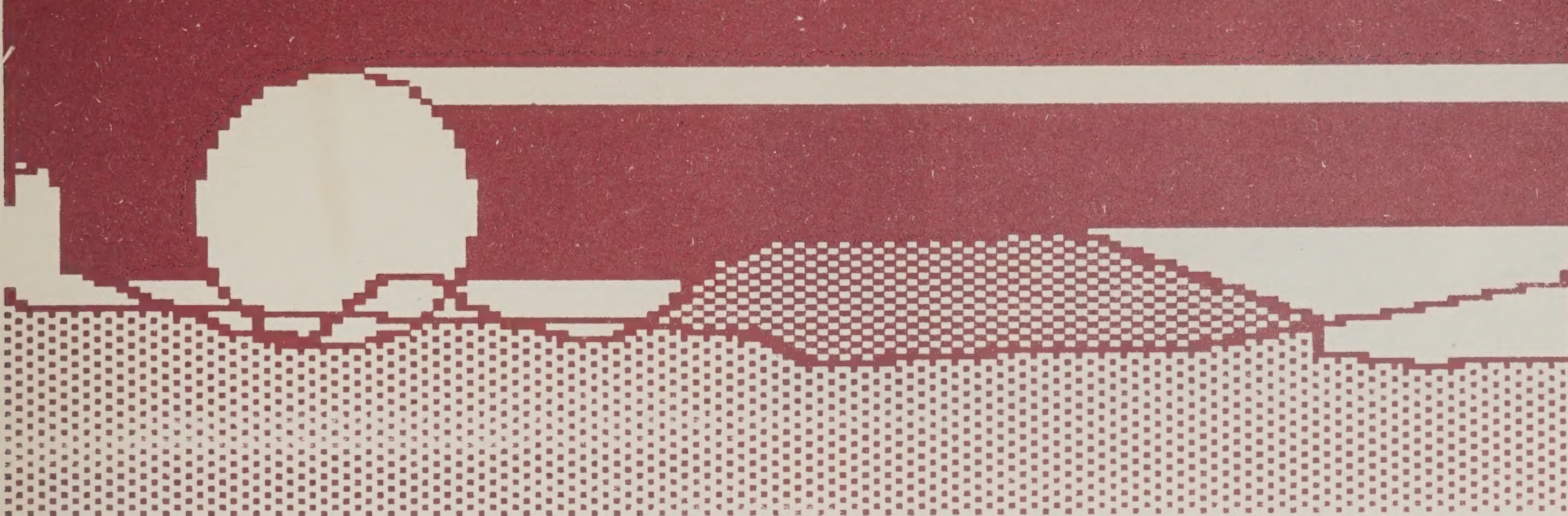
基督徒很喜歡強調中庸之道，做事切忌鑽牛角尖，故此很多基督徒經常引用「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是有益處」，而當有弟兄姊妹有興趣探討一些較尖銳的問題，例如新派神學、三位一體、聖經無誤論、神蹟可信性，田立克和布特曼等神學，還有婚前性行爲，同性戀等問題，我們均會勸他們小心，一定要一個明確的聖經立場，否則只帶來一片混亂迷惘，不知所措，不單叫自己跌倒，也動搖初信與靈程不高者的信心。我們均奉「不要走極端爲金科玉律，凡事必定以聖經原則爲本，否則只有破壞而無建設，只徒然絆倒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最好還是不去的士高，不飲酒，少玩電子遊戲機和少做一些可能絆倒人的事。以上所言的思想方式和做事原則其實是香港大部份基督徒的現況。這種凡事以聖經基礎和中庸之道爲首要的做事方式固然是應當的，但我們往往把這些原則過份簡化，成爲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

雖然所有的基督徒群體所宣稱他們所堅持的均合乎聖經教導，但很多所謂「聖經立場」不過反映某一些人的價值取向和他們本身的文化，宗派等背景。故此雖然同樣是基督徒，但對聖經絕對性，神蹟可信性，三自教會，關懷社會等問題可以迴然不同甚至敵對。最重要的，聖經並沒有對每件事均有明確落實的立場，因此並非每件事都非黑即白，也正因如此，基督徒在很多問題上均無所適從，例如性和倫理等問題。因此當有人探討這些問題却未有一套答案時，我們實不應簡單的以「有破壞、無建設」扣帽子，同時，我們似乎只容許弟兄姊妹在公衆場合講一些教導性、有清楚答案和積極的言論，若有弟兄姊妹提一些未有答案的問題，便可得被冠以「太消極」、「太極端」、「小心令人跌倒」、「有破壞、無造就」，但是否每件事均可以簡單的以拆毀或重建來二分。是否有一、二、三、四的教導就是建設性和有造就，而提出問題就是負面和對弟兄姊妹無幫助。

至於所謂「鑽牛角尖」，即純粹是相對于某一個標準，因爲有一個「正統」才有「異端」「走極端」，至於「正統」與「異端」的分野是因着時間、文法和社會的改變而修改。故此我們實不應濫冠以「走極端」來阻止弟兄姊妹去探討問題。他們需要的是指引而不是禁制。同樣的，「不要令人跌倒」亦被濫用成爲阻止弟兄姊妹做任何事的理由，因爲人總不能保證所做的事不會間接的使人跌倒，與其消極的「斬腳趾，避沙蟲」不如正面的面對問題，例如與其恐怕有人跌倒而不落的士高，不如向他們解釋落的士高跳舞究竟有何不妥。這樣開放的正面的討論態度反能打破我們的禁忌心態。

事實上，香港絕大部份的基督教機構，雜誌和群體均有其鮮明的信仰，我們眞正需要的，却是一種開放和求眞的態度，願意敞開各人的成見偏執，來探討香港基督徒所面對的問題。

（本文作者爲港大同學。）



「絲路」旅程之前奏

蔡家玲

「生命似流水：涓涓津津是嬰兒，活浪活浪是兒童，漩流激湍是青年，奔騰咆哮是壯健，汩汩平流是晚景，奔向大海是回歸。」

（司馬長風）

七年的中學生活是一段令自己難以忘懷的日子：同窗之間坦誠的相處及眞摯的情誼，在學校團契中事奉的甘與苦，在學生組織內工作所遇到的難處及所受到的箝制，幾位很獨特的老師之人生觀及對生活之體驗……這一切一切，不但幫助了我成長，也成爲了我信仰歷程中重要的部份。

然而，在那匆匆掠過的二千多天裏，「活浪活浪」及「汩汩平流」似乎是我們最主要的生活模式——絕大部份同學都很陶醉於溫馨的小天地中，滿足於狹隘的思想領域裏；願意下功夫探討中國問題或積極關心社會的，僅是鳳毛麟角而已。在預科那兩年，我的心底就時常泛起這一串問題：是甚麽因素促使這一代的青年人（特別是中學生）樂於徘徊在兒童時代的生活形態中呢？是沉重的功課壓力及優勝劣敗之考試制度？是大衆傳播媒介所傳遞之平面意識？還是由於他們根本未能在香港這個特殊的環境中建立一套較整全的自我觀呢？正當這些疑問像陰霾似的籠罩着我的內心世界之際，一條新的路徑漸漸在我眼前展現；於是，我便帶着一份征途者的心情踏上這條在香港聲名大譟的「絲綢之路」——香港大學，渴望能擺脫管窺蠡測的生活，尋覓所謂「漩流激湍」之眞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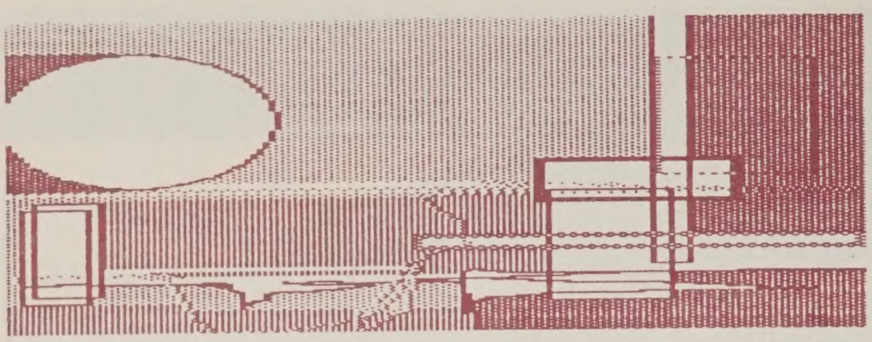
※　　※　　※

在正式踏進港大的門檻前，首先上了兩節很寶貴的「預備課」，第一課，是港大基督徒團契所舉辦的迎新退修營。

那次迎新營的主題是「作個基督徒大學生」，作爲一個導向營，它確實推動了我更仔細及更切實地思想生活在香港的基督徒大學生的特殊使命，展示了在校園中各種參與及事奉的機會；在我底腦海中開始浮現出一幅較鮮明的「漩流激湍」的圖畫，它帶給我無比的興奮，但也挑起了一份我曾竭力埋藏在心底的戰兢：我深知假若我眞要體驗那種生活的話，就必須付上很大的代價——我不是一個不願意付代價的人，我只是懼怕自己會盲從附和，在沒有重大意義的事情上付出了不恰當的代價，白白浪費了一去不復返的幾年大學生活，更辜負了神的恩典。因此，在「主啊，我在這裏，請差遣我！」這微聲禱告的背後，我更懇求主賜給孩子足夠的洞悉力，使孩子眞能按着祂的旨意踏上這條「絲綢之路」的每一步。

但在另一方面，那次的迎新營也令我對一部份在港大團契裏較爲活躍的基督徒底「屬靈質素」產生質疑。在短短數天的接觸裏，他們一般所給與我的印象是高傲、冷漠、喜愛高談闊論而忽略了具體的生命流露，與我在教會中認識的弟兄姊妹截然不同。這些片面的觀感曾一度揉碎了我對未來數年大學生活的憧憬；我想：如果大學教育只會令我變成一個擁有知識而失却謙卑的人，我寧願放棄尋求知識的渴望；假若自由開放的討論風氣只會把我鑄成一個徒以高妙精奧的言論來建立自己的形像及掩飾心底之失落的人的話，我情願仍舊把自己關閉在狹窄的圈子裏，與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分擔眞正的切膚之痛，並同心把關切之情溶化在禱告之中；如果……一首取材於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的詩歌正道出了我當時的主觀感受：

「我若能說萬人之方言天使話語，
却沒有愛，
空有聲音對人何益？



我若能講道預言信心能移山——
我也不算甚麽——
若沒有愛……」

當然，我也知道自己不該過早對港大團契的弟兄姊妹作出任何判語，畢竟，我仍未有機會較全面地去認識他們，較透切地去了解他們的心態。然而，令我感到惋惜的是：不是每一個基督徒「新鮮人」都會讓自己有更多機會去認識港大團契的；其中一位「新鮮人」姊妹的故事就令我感到很灰心。

她是一位我在中學時代所認識的姊妹，最初，她帶着一份很大的期冀參加那次的迎新退修營，盼望能在港大團契中建立自己，發掘自己的恩賜，並探索神在她身上的計劃。但是，性格頗爲倔強及偏激的她，却完全不能接納港大團契的弟兄姊妹在退修營中所表現的態度；特別令她感到不滿的，便是在分組時間內那種不甚友善的爭論氣氛——她可以接受組長發出的頗爲迫人的問題，也欣賞那些問題背後的建設性，然而，她却不能容忍組長那份「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狂妄及不願聆聽「新鮮人」之意見的頑梗態度。結果，她在迎新營的第三天便毅然離開了；一份強烈的失望之情更令她對以後團契所舉辦的活動望而却步。每當我在校園裏遇上她時，不期然就會想起她在離營前那夜對我和另一位姊妹所傾訴的感受；在迎新營程序手冊的第一頁中有這幾句說話：

「迎新不單是迎接新同學！
不單是純感情的交往！
不是洗腦！」

對她而言，這些字句只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不打算在這兒對港大團契所舉辦的迎新退修營作任何評價，因爲深信它對不同的弟兄姊妹會有很不同的影響；況且，這些影響亦可以是深遠的——就是在今天，我仍未能完全領會它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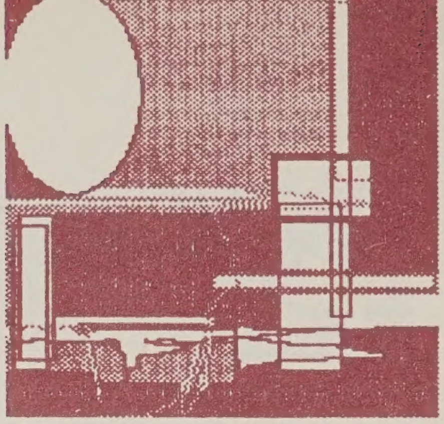
※ ※ ※

緊接着團契的迎新退修營的，是法律學院的迎新營，也是我在踏上「絲路」之前的另一節「預備課」。

在考慮是否該選讀法律的那一年裏，自己曾聽過不少別人對法律學生所下的評語，因此，當我參加那次迎新營的時候，其實是帶着一副「有色眼鏡」及一份戒備之心入營的。然而，僅僅兩天的相處却令我不自禁地放下那副顏色深沉的眼鏡，以誠懇開放的態度與他們溝通。根據我個人觀察所得，法律學院實際上是一個很典型的社會縮影：在當中不錯是有些趾高氣揚及被名韁利鎖束縛着的學生，但也不乏平易近人，有正義感及抱負的師兄師姊；若以某些稱號冠在所有法律學生的頭上，則未免是過於武斷了。現在，讓我嘗試描繪幾位在迎新營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法律學生吧。

第一位認識的非基督徒新同學，是一個柔弱、倚賴性強、胸無城府的女孩子，她完全不符合法律學生一向在我心目中的形像。在與她交談時，發覺她在選修法律之前，並沒有經過愼重的考慮，雖然她曾坦言地自承有點是爲了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她却完全沒有想過在所謂「社會地位」的背後要付出的代價及犧牲，更對社會公義這問題抱消極態度，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看法。在信仰方面，雖然她也相信基督徒所崇敬的主，但却認爲她心裏相信便行了，沒有必要加入教會或參與各種所謂「宗教活動」。我一邊爲她那種「爲生存而生活」的態度感到惋惜，一邊也爲這位傳福音的對象而感謝主；我明白一場屬靈的爭戰已經展開——惟願在撒但的權勢及社會的風氣還未完全侵佔這位女孩子的心靈之前，福音的大能引導她邁向一條積極的人生大道。

另一位給與我很大反省機會的新同學，是一位曾經參加過兩間教會的「流失人」。由於他與我同住在一區，所以離營後的回程途中，有機會和他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交談。他有一位在他考進了港大後獻上特別奉獻的基督徒母親，有幾位在中學時代跟他很談得來的基督徒同學，但他却始終沒有找着一間能夠造就他的教會—過去他曾踏足的兩間教會都令他失望：從他的剖白中，也不難看出他在決定離開教會前經歷過的掙扎，與及那份無奈的情懷，時間不錯是可以醫治他昔日在教會中受到的創傷，但亦同



時冷却了他對信仰底熱誠：除了我之外，他並沒有向任何新同學表明他基督徒的身份，更沒有參與法律學院團契的任何活動。除了爲他獻上默默的祝福，祈求神的愛火能再度在他的心底燃燒外，他的經歷也催迫我更認眞地去檢討教會現存的問題，探索更完美的教會模式。

在那次迎新營的第一個晚上，也有機會與幾位高年級的同學討論九七問題及其對法律學生的影響。一位因獲取政府獎學金而進入法律學院的前任偵緝督察口若懸河地提出他的意見，他認爲在目前風雨飄搖的時勢下選修法律，就恍如下了一筆很大的賭注一樣，輸光了便會有慘淡的收場，因爲沒有人可以預知香港將來的法制會有多大變動，更沒有人可預測學習英國「普通法制」的法律學生的前景將會如何；從他的言論中，我隱若瞥見一些對香港前途充滿憂慮的中年人的影子。至於另外幾位熱血沸騰的年青法律學生却比較樂觀，認爲在畢業後他們必定會有用武之地，甚至還可能有機會協助中共政府改革法制，爲本港的市民爭取民主……一連串偉大的理想，令我感到振奮及欣慰，然而，當晚上自己獨個兒在床上靜思時，却想到一些很現實的問題：假若有朝一日他們需要在優俸厚祿和民主法制兩者之中任擇其一的話，他們仍會篤信民主嗎？眞希望民主不是法律學生包藏個人利益的華麗外衣，在它失却了掩飾作用之際便會隨時被撇下；更祈求主保守孩子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中永不失脚。

※　　※　　※

上罷那兩節令人難忘的「預備課」後，我便開始收拾行裝，準備征服那漫長的「絲綢之路」；除了一些必需品外，我還隨身携帶了一節很寶貴的應許：

「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
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門。」

（賽四十五：二）

就這樣，期待已久的「絲路」旅程便正式展開了。

※　　※　　※

時光悄悄地溜去，轉瞬間，踏上了黃沙萬里的「絲路」已有多月了。在這些日子裏，我一方面有機會親身體會「戴函」事件在校園內外所引起的軒然大波，並透過此事而對法律學院中某些同學的心態有更具體的掌握；但在另一方面，自己也得面對在心底裏因各種抉擇而掀起的小風波：教會的牧者及導師勸我不要太投入校園內的各種活動中，以減低逐漸與教會疏離的可能性；家人也希望我能抽出多點時間留在家中，與他們共敍天倫；中學時代的同學會則催促我開始計劃未來一年的各項活動；然而，爲法律學院一年級同學而設的一連串福音性聚會正籌備得如火如荼，我又豈能在此時「洗手不幹」呢？況且，我亦很希望知道神在這事上的旨意如何；至於《橄欖》的崗位，也是我不欲捨棄的；還有其他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擱下的工作……。

曾經有一段日子，身、心、靈都感到極度疲乏，整個人就像被撕裂一般，不能在任何事情上全心全意地投入；而當我正亟欲向週遭的同伴發出求救訊號時，却猛然發現四周均瀰漫着同樣的求救訊號——我開始感到徬徨、無助及孤單……。

感謝那引領我踏上這條「絲路」的嚮導，當灰心、絕望開始在我底心湖中泛濫的時候，祂屢次提醒我在所謂「旋流激湍」的生活裏尋找平靜和安穩。在一個美麗的黃昏裏，與法律學院的幾位弟兄姊妹漫步於「絲路」中的某一小徑上，沿途發現了兩個在電燈柱上蓋建的蟻巢——它們精密的結構及位置的適中都令我們感到萬分詫異，更驅使我們對那位造物主奇妙的安排發出讚嘆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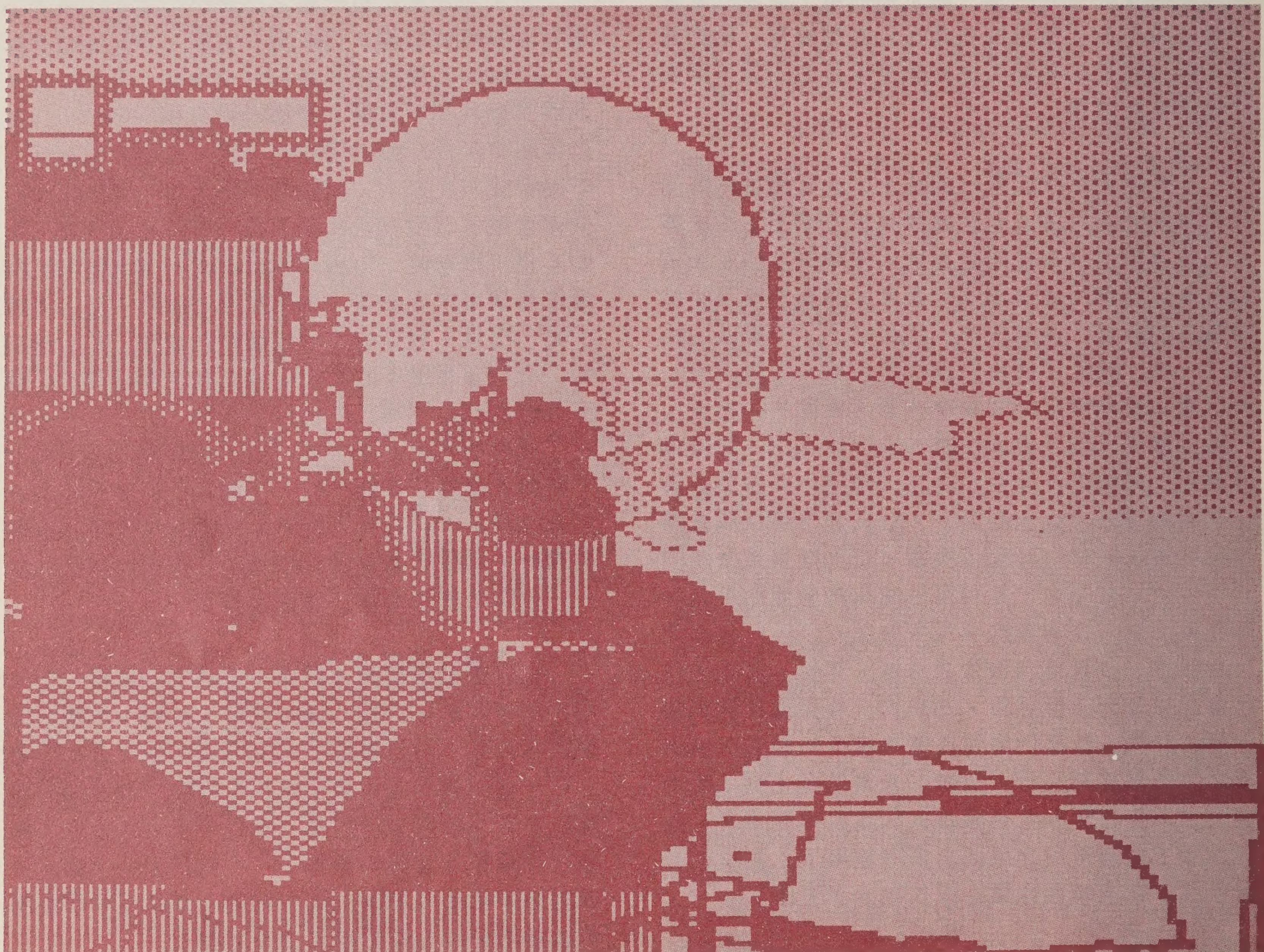
「我曾在藍天中尋找耶穌，
或在金光燦爛太陽之中，
在每片葉或每朵花，
我總能尋找祂……」

一份更新的信心再次在我心頭湧起，於是，手持着一根由對生活之執着及對生命之熱誠而製成的火炬，我開始繼續奔跑這條令人感到撲朔迷離的「絲綢之路」……。

（作者是港大法律系一年級學生，《橄欖》編輯。）

我要離開橄欖了

周華山



離開了AA　COMMON ROOM，陸佑堂鐘樓上的旗因無晚風而頹然下垂，呀，是最後一次編委會了……

拖着疲憊的身軀，嬉笑地作別了弟兄姊妹，心情竟是非常的沉重，甚至有點荒迷惘昧。心裏不斷反覆盤旋着的，却是一些沒有簡單答案的問號。面對這個社會，無庸諱言，我確實有太多的不滿，而教會對現狀的回應又是那麽的蒼白無力，但更令我遺憾的，却是我們這群大學生，正當香港將要步入一個關鍵性的年頭時，我們却沉溺於個人感情、學業和人際關係的糾纏裏，甚至渾渾噩噩的就虛度了幾年大學生活。我不禁問：倘若我們做了天國的逃兵，還有誰去爲香港教會出路去愁煩？誰去接教會的棒？難道去認識PAUL TILLICH，MARTIN BUBER，KARL BARTH和JACQUES ELLUL 等眞的是鑽牛角尖，談教會模式、信仰反省的只應由傳道人和神學家去涉獵？

CA究竟有甚麽出路？神呀，　何時才復興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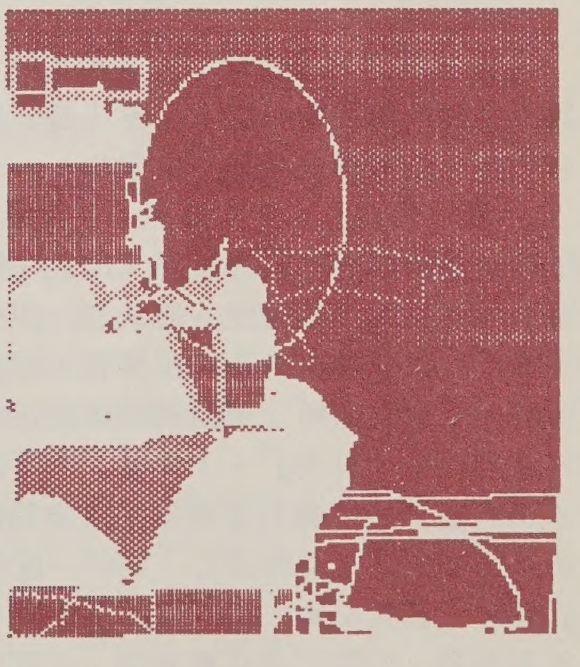
實在很懷緬在《橄欖》裏的日子，尤其是與錦光、濟全和啓見幾個傻小子一起的浪漫生活。也不知多少個星期四晚上，在AA　COMMON ROOM開會，然後往水街宵夜，再在街上遊蕩蹓

躂，或在西環的貨車上，或步至中環的海濱，甚至通宵達旦，由國家大事、教會現況、校園文化、社會環境扯至自己的抱負、家庭，以至表哥表妹……回顧那段風流快活的豪情時光，就叫人聯想起古典大學的生活。儘管我們有過不少過份之處，但，我仍要感謝神放我在《橄欖》的寶貴時光。

但更要感謝神的，却是信仰上的衝擊。因着《橄欖》，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基督徒，甚至與教會裏的弟兄姊妹是壓根兒大相逕庭的，由最基要到最普世，保守到開放，正氣到激進……這一切都給予我極大的反省。

例如那次訪問廖寶泉，我們由他的成長過程，信主經過、中大宗教系的經驗扯到他之所以推動ＳＣＭ（基督徒學生運動），以至其神學思想人生態度，比如對聖經權威的保留，對聖經神蹟的神話性質觀點……當時我連基要派和普世派是甚麽還混淆不清，因此廖寶泉於我，就有如洪水猛獸。對一個自幼在一個頗保守的宗教背景長大的人來說，廖寶泉的言論顯然是異端無疑，但更重要的是，我竟然完全無力招架，而他所引的經文和神學基礎，聽來也覺頭頭是道。故此，他就害得我連「鋤」幾天神學書籍，驚愕神學天地的豁然浩瀚，而自此，我再不敢動輒以「異端」、「新派」亂扣帽子。

之後，我認識了張子國，他對我的震憾就更加厲害。他仿似一個在少林寺修行了幾十年的高僧，亦如長空畫過的一顆彗星，炫人耳目。才三十出頭，但已飽歷世情，看透人間險惡，雖懷經世之才，但未爲人世容納，宛如落泊英雄、江湖怪客。尤其是他對教會精警獨到的批判，對福音機構的無限感慨，又一語道破現今基督徒的危機與問題根源，在在都恰似當頭棒喝。加上他那極富傳奇性的成長和經歷，孤兒的自我掙扎，多次身罹大病的辛酸，驚人的學業成績，中大港大的半途鄙棄，變化多端的工作經驗……這一切自然叫我這初生之犢讚嘆不已，亦使我強烈的感受到自己的膚淺和浮誇庸俗，我開始對自己的信仰作出全面的檢討，對信徒的人性，基督徒與社會的關係等課題作徹底的反省……



還有子揚。第一次開會看見他，他已經給我一種「ＣＡ猛人」的感覺。對神學、香港教會、中國教會以至社會問題，子揚都有其甚有見地的註釋。最初開會時，我根本聽不明他的術語，如ＣＣ、三自、馬老大、新馬仔、溫Ｂ、基要佬等……儘管張子國、子揚等均相當犬儒、抽離，甚至邊緣，亦鄙視道德教條和太正氣的思想，但他們那種體驗和求眞的態度，却直接反映了自己的浮淺和無知。漸漸我體會到有太多地方急待我們去投身和拼命，我委實不能再蹉跎歲月和緘默自守。我嘗試讓自己開放，去接觸更多不同的觀點、事物和人，也因此開展了自己信仰另一個新里程。

※　　※　　※

在不斷開放自己的過程裏，我猝然發覺自己原來一直是困于一個狹隘的小圈子裏，以為教會四堵牆就是唯一的眞理，其實却在背負了許多不必要的傳統包袱。例如一個很個人化的信仰，只強調個人得着，與神關係而抹殺了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忽略了作爲一個群體，我們應如何見證神；神的旨意也往往變成Ａ，Ｂ，Ｃ，Ｄ的選擇，而非作爲天國的子民，我在整個群體裏可以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又例如信仰往往給動聽但空洞的術語所困鎖，如合一、均衡，得着、屬靈觸覺、「萬事互相效力」、「凡事都可行」等；還有濫用了人神關係還原法，萬事皆訴諸人與神關係的問題，還有屬靈與屬世的二分，（如讀經比游水更屬靈，先做好讀經祈禱才去關社等），此外，還有……

正當我沉醉于信仰，校園和香港教會的問題，我與教會的關係急轉直下，有時拖着疲乏的身軀返到教會，却莫揶揄幾句「大學生」、「關懷社會」、「鑽牛角尖」、「太屬世」，我越來越發覺我們是屬于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小圈子，漠視人間的苦疾。終於在一個分享會上，我分享了自己這年來的改變和反省，希望給他們一點衝擊，但那就開始了與團契關係的正式惡化，他們只感到我是「自大」、「理性」、「極端」，只要求他們去關社，鋤艱澀抽空的社會問題，猝然間，我感到非常之失望和灰心，爲何一股熱誠却換來重重誤解，甚至揶揄，我不過嘗試提出一個「正確」的福音觀，他們却是那麽封閉，只死守舊有一套，連一些較開放的也拒之千里。

很感謝神，因爲在這段時間，我接觸了很多畢業生（多年前的），我強烈的感受到他們那股踏實的深度屬靈質素，使自己漸漸感受到以往的浮淺，對傳統不屑一顧，不動就以「信仰太個人化」、「太溫馨、「不問世事」來批判弟兄姊妹的失當；又硬要他們接受我以爲最正確的信仰觀。

※　　※　　※

除了在《橄欖》外，大學同學也帶給我很大的反省。每當我聽到有弟兄姊妹瀕臨流失邊緣，我心裏都起了極大的震盪和感觸，但這些消息實在太多，更重要的，很多皆爲我的好朋友，甚至曾是死黨，因此，很體諒到他們內心的掙扎，如對教會的不滿，對基督徒的失望，長者的封閉和道德主義，甚至對福音的大能感到懷疑，但這些豈不是我的掙扎呀？

我越來越感受到，現實社會就如洪水猛獸，但不是明顯、浪漫式的衝擊，而是暗地裏、無形、不察覺和慢慢的侵蝕，只是一些生活小節，就如去SHOPPING，落淸 BAR 傾談，出入坐的士，去HUGO食飯，彷彿一切皆難辦黑白，但就是這些微細的生活小節使不少畢業生改變，正如一位弟兄指出：「畢業之後那年，我連一本屬靈書也未有看過，拍拖之後，更漸漸把讀神學和全職事奉的心志拋諸腦後。」事實上，很多同學大學第二年，已開始心境老化，凡事感觸化，早失掉一年級時的活力和衝勁，宛如飼歷蒼桑，甚麽理想，壯志皆變得很遙遠，畢業後，自然很快就會安頓起來，返返教會，參與一些事奉，已算不差吧！

但，我甘心嗎？

※　　※　　※

我要離開《橄欖》了。在《橄欖》這一年委實太難忘，甚至可以說是我的轉捩點。想起那些開會、鋤問題、自己鋤書、訪問、與錦光、濟全、啓見的浪漫日子，這一切都使我改弦易轍，心態、思想、關注範圍都有很大的改變。但同時，我日漸體會到繼續留在《橄欖》的危機，孤芳自賞、狹隘……因此決定出外闖闖。對於將來，我實在有太多的計劃和理想，但現在，只求踏實的去學習和體驗。委身　實是一條漫長而且崎嶇艱難的路，自己亦不敢作任何偉大的諾言，但求神繼續憐憫。

很體會到一句說話：「BY GRACE ， I STAND.」

給新鮮人

沈濟全



引言

隨着政府部門職位之開始公開接受申請，筆者與其他三年級的同學均輕嘆轉眼間，又是第三年了？看着校園中大群的新鮮人，匆忙的走着路，在圖書館、在KNOWLES的升降機、在CANTEEN，筆者不禁想起兩年前的自己，一個一個片段歷歷在目。大學生活，確是一個嚴厲的成長催逼！

前些時候，因着筆者要為文學院團契的迎新營負責一個分享會的關係，曾對大學生活作過一點思想上的總結，也歸納出一些東西。這點點東西對新鮮人來說也許也有點適切性，於是這篇文章便給寫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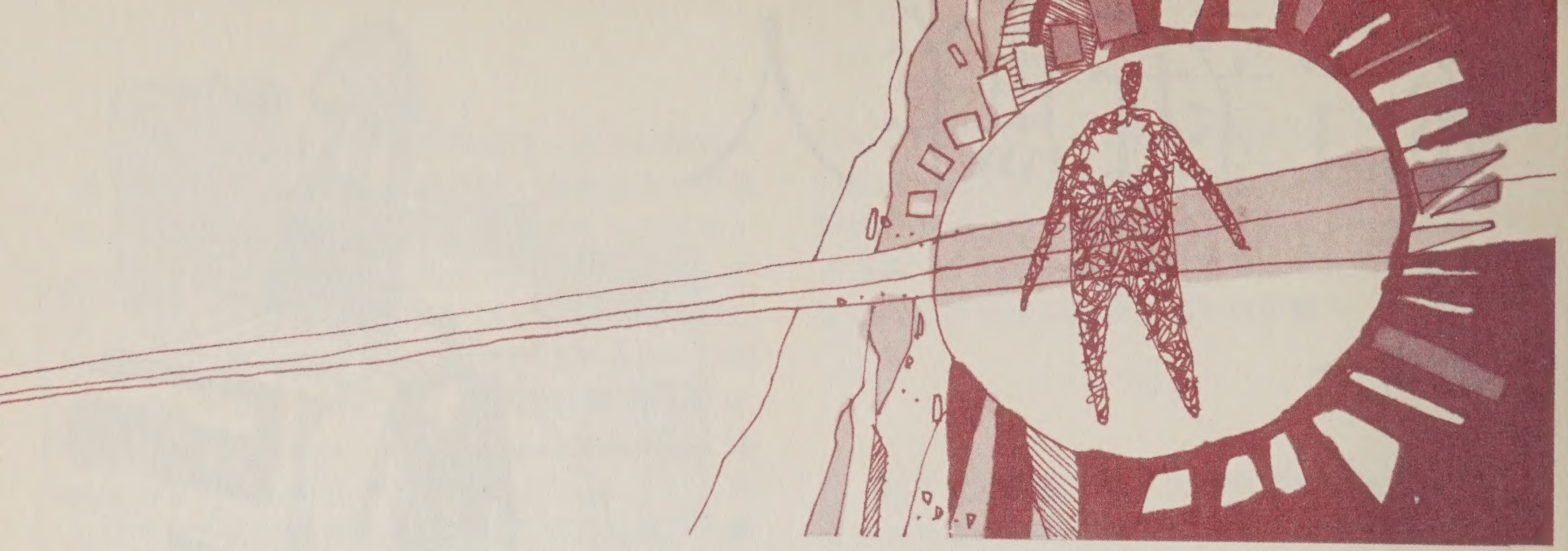
新鮮人的困惑

大學生活，無可否認，是人生的一個轉捩點。其內容加起來，就是要把人推向一個更上一層樓的成長。對於一個由中七步入大學校門的人來說，他首先會面臨一連串的改變，而這些改變也就帶來了一連串適應上的問題。據筆者的觀察，新鮮人在開學之時所遇到的問題大多是基於以下三種主要改變而引起的。

(一)從中學生到大學生

從中學生到大學生是個身份上之改變。首先是這個身份的教育含義。從前作中學生時，學校是朝八晚三的，時間和課程都是安排好的，是不用操心的，老師的教授是直線式的傳授，並且經常「關心」着我們的成績，督促着我們學習。我們有自己的班房，甚至書桌，同學們都是認識的，學校的環境都是「溫暖」的。那時沒有任何思想上、觀念上的新挑戰，有的就是考試、讀書、考試……。今日來到大學作個大學生時，什麼都好像改變了一般。大學的建築好像是冰冷的，人是陌生的，課室是沒有歸屬感的。今天，課程是選讀的，時間是自由的。在課堂中，老師是遙遠的，在KNOWLES上堂更像看電影一般；並且有導修堂需要我們參予討論，要求有自己的意見。做功課時不再有指定的資料，而是要自己上圖書館去找尋。今日學習時，再沒有一個好像中學時那樣明確的目標—考試了。

中學生變成大學生也暗示了別人對自己期望的轉變。過去，無論在家、在學校、或在教會，別人始終看自己為未懂事，從而不大介意我們的言語行動，做錯事也較易得到接納。今日，隨着很多大學生經濟漸漸獨立，父母對我們大多刮目相看，容許我們有更大自主權；而我們的意見也就更得到家人的重視。在老師或同學的眼中，我們是被期望為一個獨立、有自己思考及決斷能力的人，結果就是再沒有人對自己呵護備至；遇有意見不同時，別人會直接的「鋤」我們。在教會，一個讀大學的弟兄或姊妹通常都得到後輩的尊重，教會長者也刮目相看，種種事奉位置接連臨別，因為你是應該「掂」的。



這身份的改變帶來了一個自我形象的適應問題。很多時自己的主觀意願與客觀環境格格不入，於是產生情緒低落、怕新環境、混亂、不知所措等等感受。

㈡從紀律約束的環境到自由的環境

中學是一個紀律嚴格的地方，要穿校服、有詳盡的校規約束着每個人的行為、課堂要點名，活動地方細少，每日有七至八小時是不用我們費心而有所安排的。放學後通常不超過六時正便會回家吃晚飯，跟着便要投入那有規律的溫習準備那高級或高等程度的會考。父母對我們的開支和行動會有所限制，對於女孩子來說，「出夜街」可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至於教會，更不消說是個充滿紀律的地方。總括來說，中學時代，我們的活動範圍不出家庭、學校、溫習室及教會，而處處也都充滿着很高紀律性。

踏入大堂，環境有了一百八十度之改變，對入住宿舍的同學來說尤是。今日沒有了校服，也沒有了那控制人衣着、髮型和行為的校規，課堂不是必須出席的，時間表是空白的，要我們自己來為它塡上活動，我們要在這自由的環境中學習抉擇。校園中，課外活動是多姿多釆，充滿新鮮刺激的，每一個屬會不再有背後控制的官方力量，你可以自由的去搞。使人眼花瞭亂的活動、講座、探訪、交流會、研習班等，都要由我們自己去抉擇參予與否。而校園生活的充實及使得我們圈子擴濶，漸漸速離家庭，甚至教會的圈子了。大學生的稱號又使很多人有了條件去兼職賺取「外快」，於是經濟上也自由了。總之星期一至七，我們大致上都是自由的，如何去過活是由我們自己去決定的。

面對着自由的新環境，帶來了我們的時間分配及如何對事物抉擇的問題。有人天天匆匆忙忙，雜亂纏身；也有人在圖書館畫下專用座位，天天「辦公」；也有人無所事事；更有人 FUZZY 加睡覺渡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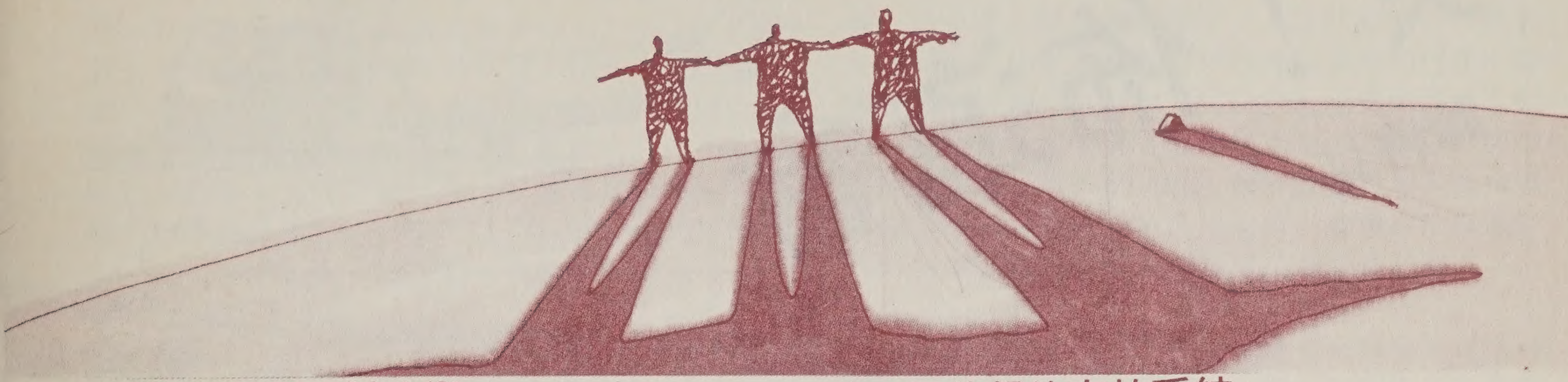
㈢從小圈子心態到自我獨立

在人的成長歷程中，在少年時代均有一種很強的小圈子心態（PEER GROUP MENTALITY），故此在中學生時代，我們都多有一種小圈子式的集體傾向。這種心態的具體表現就是，例如穿着類似衣着，有着類似的愛好；喜歡聯群結隊作伴參加活動、吃飯和溫習等；對非我圈子者採冷漠態度，「話不投機半句多」。這時候的我們十分需要安全感，喜愛溫情，害怕孤單一人，更害怕陌生的環境。舉個例就是教會的少年、少青團契之類組織中，這種傾向是特別明顯的。

由中學至大學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由青少年進入成年人的一個過程，而作為成年人的一個要素就是獨立。大學裏面種種環境安排都要求培養這獨立的要素。大學教育要求我們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大學裏面的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有各人自己的時間表和生活圈子，更有個人的價值觀，思想形態以及生活方式。儼如一個小社會。人際關係的建立並不像過往一樣主要基於溫情的需要，並且因着個人的獨特性強烈，相交也不像少年時代般容易進深。這樣獨立的氣氛對新鮮人來說確實帶來很大的冲擊。有人感覺孤單，沒有支持，沒有群體的認同感。有人嘗試把自己劃入一個溫情的小圈子中，不問世事；也有人變得愈來愈「個人主義」。

三點反省

總而言之，對於一個新鮮人來說，所有在開學之時心中困擾的問題，十九是不出以上三種改變所帶來的。基督徒可能在種種適應上，再問究竟什麽是神的旨意這問題，以至思想更加混亂及複雜。筆者無意在此回答以上種種可能產生的問題，因為那是一個時間適應的問題，並且每個不同的人在其不同的處境中，應有他本身不同的處理方法，不能一概而論。不過在筆者兩年多的大學生活體驗中，也總結出有三點反省，對理解大學生活是相當重要的，也嘗試在此提出作為一點勸勉。



(一)以正面態度面對改變

正面（POSITIVE）的相反自然是反面，反面的態度大概有兩種，一是逃避（RETREATIST）的態度，二是否定的態度。據筆者觀察，終其三年也不對校園產生歸屬感，生活就是上堂，做功課加兼職，對大字報、《學苑》不聞不問，總之就是少在校園出現為妙的同學是大有人在。逃避者會以功課繁忙，要負擔家庭又或教會事奉忙碌等來為自己解釋。而否定者則會謂校園太多冲擊，充滿思想陷阱，試探太多，校園團契路線走歪等來論辯。結果就是兩者都不願面對環境，接受改變。筆者的起點就是我們入大學是神的呼召也是神的恩典，若要經文根據，在迎新之時說得很多了，不再重覆（參彼前2：9，斯4：13－16，何4：6，太25：14－30）。這背後也就含有一個義務和責任，對自己來說就是要自我學習裝備，準備畢業後的事奉方向；對外而言就是要參與在校園裏見證神的國度，作基督在校園裏的代表。在這意義之下，大學的教育，校園中的人和事，以至整個環境，都必定對我們的成長有意義，而需要我們去面對，理解和學習的；所以我們應該以一正面態度來接受和面對改變。

(二)大學教育等於大學生活

在本港一片知識專業化、專門化之趨勢下，傳統大學教育的理想精神是日漸失落的，但對於如何理解自己今後的數年生活，筆者認為先瞭解大學教育意義是必須的。過去我們對教育的理解就是課本，考試範圍、測驗再加公開試，但今天踏入大學，就必須對大學教育先行定義。對筆者來說，整個大學生活都是大學教育，因為在大學的環境下，無論課堂、導修、自我研讀、校園活動、講座、學生刊物、人際關係以至生活上每一部份，都顯示出一種獨立、自主、自由、科學、客觀、著重個　性的氣氛和精神，這就是大學教育的基本精神。在這個意義下，接受教育便等於接受整個生活之鍛練，所以筆者強調的是，除却選修之課程外，課外活動參與、環境的關懷及生活的體驗都是我們在抉擇如何過我們的大學生活時所要鄭重考慮的。

(三)一個基督徒支持系統

當我們今天成為大學的一員時，無論我們願意與否，我們都成為校園團契肢體中之一份子，而需要負起在校園中見證神國的責任，弟兄姊妹之間也就應該是一個肢體互助配搭的關係，務求發揮最大的功能。當然在具體參與的取向上，可能只有部份人會實際參與團契安排的具體工作或小組，有些人可能覺得應該在非基督徒圈子闖闖，也有些人選擇參與教會的事奉工作。這些不同取向也都無可厚非，但無論對任何人來說，我們既在校園團契的大家庭中，一個能坦誠相交，互相激勵的基督徒支持系統便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筆者回顧自己過去兩年的大學生活，其中感覺收獲最大的就是得到數位肝膽相照、憂喜與共的知己，在那直率坦言、互勵互勉，彼此以愛心相「鋤」的相交歷程中，彼此開拓了思想的領域、關注的範圍、激化了個性的成熟、發掘了彼此的恩賜及未來的事奉方向。筆者相信人與人間深入相交是需要基礎的，那就是共同的信仰、相近的思想深濶度，類似的環境與經驗、近似的關注等，對於一個大學基督徒，他的支持系統自然最理想的就是校園中的肢體了。總之，筆者認為要有理想的校園生活，我們實要好好的參與校園群體見證，開放自己予其他肢體，建立鞏固之支持系統。

結語

大學生活只是我們人生中的一個階段，像人生每一階段一樣也有其特式、挑戰、裝備和獨特意義，固然其中也會產生一些困惑和問題，但都只是成長的必經歷程而已。這大學階段的重要性就是使我們由少年人變成年人，由倚賴人的人變成獨立的人，和從中學生變成知識份子。若我們都有一個誠實、勇敢、開放、求眞和交託神的態度，這數年必然會是一個祝福！共勉之！

（本文作者為港大同學，港大團契八三年度迎新事務籌委之一。）

唉！佈道會

譚啓見



回溯

一貫以來，基督教的傳播靠的是宣傳，佈道會奮興會等等成了殺手鐧，比方說中國基要派教會的平民奮興佈道運動期間（即三十年代），便有陳崇桂、王明道、計志文、倪析聲、宋尚節等先生爲首的各大小全國巡迴佈道隊，而戰後趙世光先生經年不斷的娛樂戲院週日佈道會更是以歷時長久得名，五十年代起的葛培理全球性巡迴佈道大會，更加膾炙人口。不過，得救人數似乎與宣稱決志人數判若雲壤，彷彿每個人都愛決志十次八次的，殊不驚奇。

如是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香港教會亦源用此手法，大大小小的佈道會相繼登場，佈道會被視爲信徒增長門徑，習慣循例地籌備舉行。從前因經濟水平差，民生疾苦，加上港人多乃逃港避戰避難難民，人心惶惶，於是免費的講座成了沒有多大消遣、教育水平較低的市民的好去處，赴會者與決志者皆能維持一定數字。但隨著社會環境變遷，今天，佈道會成了基督徒的尷尬，不舉行嗎？內疚不安。舉行了，却又賣力不討好，只賺得一身雞皮疙瘩。

性質

先唱三兩首幼稚的歌，或揷上會友述說得救見證，跟着是牧師傳道起而論道，多是比擬不倫地，抽經鑽典地吶喊一番，不是挑起人家自疚的心理便是說人家人生沒意義，社會令人窒息，遂行進到高潮，苦口婆心慫恿人舉手，或以地獄威逼，或以天堂利誘，講員聲淚俱下，會衆阿門不迭，滙成一股震盪心弦的氣氛，明推暗引會衆決志。佈道會鬧劇化並非毫無因由的。

佈道會是基督教傳播採用大衆傳播方式中的一種。現今大衆傳播工具（印刷、電視、廣播、電影進步神速，更使大覽傳播透過某一媒介向多人傳達迅息的方法變得重要。大衆傳播的好處是速度高、範圍廣，但因要同時向衆多背景不同的人傳達同一內容的訊息，以求引起某種反應，故此在內容方面不得不削足就履。這是大衆傳播的遺憾，總括來說可分三方面：

1.籠統化（GENERALIZATION）：向一羣背景不同，知識水準不同，思想型態不同的人傳達同一道理是件難事，唯有採其最大公因數H.C.F.，揭除個別特異之處，以公式化、典型化換取普遍性適應。

2 誇張：人喜歡刺激，不喜歡平凡，大衆傳播不惜犧牲眞實客觀以投人所好，於是不是貶得十世翻不得身，便是抬舉爲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這是不肯面對現實的表現，大衆傳播往往成了集體麻醉，「語不驚人死不休」是最好的手段。「唔著××，不如唔著」、「想做就去做」、「人生需要享受，駛錢要講派頭」……

3.感情化：「說人是理性動物，不如說是感情動物，大衆傳播圖挑起人感情上的反應而遂其目的。故廣播劇、電視劇、三流電影、流行書多是起迭潮伏，眼淚大賤賣，緊張刺激，以挑撥人原始的衝動。廣告濫用兩性角色（如用某商品便有羣雌圍身，新的男女關係），又有順應人的無能無奈感的流行歌。

佈道會中，講員同時向數十至數萬人宣講，這是大衆傳播之一，亦難逃大衆傳播的流弊，在急欲要求聽衆有所反應，故很易入了大衆傳播流弊的陷阱而不自覺。

信仰彷彿只是超渡罪人！教會以多以快爲大前提，於是把基督教簡化成「神愛世人」、「信者得救」、「悔改認罪」等四字眞言，如此那般把基督教交待後，便快刀斬亂麻地要求決志。其籠統化的通病不單不能提供正確導引，反鑄成難以更正破除的謬誤迷信；不盡不實的先入爲主的觀念是加深瞭解的絆腳石。佈道會中固然無法把整本系統神學講解一遍，正因如此，對佈道會實應重新估價。

評價

言過其實在佈道會是平常不過，可能是偏激的見解或獨斷的判語，或是言而忘義，或是把主觀宗教體驗強作客觀事實。最嚴重的是不能讓人在眞確、平凡的現實面前衡量自己的命運。不符實際的貶抑，一面倒的褒揚和不平衡的專注，都會使會衆決定取捨失去起碼的準確性。在教會的顏色嵌鑲玻璃下，一些東西可能會變得更美麗或更陰暗，教會的顏色玻璃太多了，令人瞻仰不到眞光。

宗教少不了感情，可是佈道會多被感情壟斷，理智無法作適應的調協。詩歌及講道又多是傾銷病態傷感或賤價感情，更有講員以能使聽道者涕淚縱橫爲成功，而不知這正是自欺欺人的技倆。

佈道會如不能全面地、客觀地介紹基督教，道會對不起基督教，更對不起聽衆。佈道會若以浮誇虛張，以賣弄感情來騙人信主，更甚的是有的講員喜歡用羣體壓力逼人決志，信主的站起來，跟着是今次決志的也站起來，信徒既佔了大多數，僅餘的未信者自然不好意思在人叢中靜坐，糊裏糊塗的又變了決志人數統計表的一員。不能讓人在自我負責的原則下思考取決，佈道會是不道德的。

除了內容糊塗之外，佈道會又是鼓勵人懶惰的。信徒不懂傳福音，便借助牧師傳道的口去宣講，佈道彷彿成了專業，好像婦人不育，雇人代懷孕產子一樣，造成一個錯覺，就是福音不過是台上講員說的概念邏輯或感情，而不是見諸於人的生活。類似推論亦見於所謂「栽培跟進」，往往講完一套神學化的救贖論，即如神的存在、罪的眞確、耶穌的代贖便大功告成。說不信生命沒意思，但信了却又只能說出一堆概念化的詞語，想深一層，往往與不說沒大分別。人家說生活就是信仰，就是生命，但佈道會裏說的便是邏輯，栽培裏談的不是生活，難怪佈道會決志者留在教會的所餘無幾。知道一番救贖邏輯而沒有具體生活意義，那跟學了微積分去做泥工有甚麽分別？

聯想

憑良心說，今天教會並非不知道這些大衆傳播式佈道的短處，亦有相當思想改進以求減却其壞影響，比如說，陳喜謙牧師譯了《當代的福音：純眞、混雜？》逼使人辦佈道會時兼談委身的代價，各團契開始強調個人工作，門徒訓練的興起彰示了對栽培的重視…但佈道會仍照辦如儀，講員依足宋尙節的講道法，動不動大罵人家有罪，說別人生命沒有意思…難道現在還是民智未啓，社會政治動盪的時代，人們能夠受別人自義式的狂妄推責嗎？

翻看近年大型佈道會的紀錄，不難發現這些勞民傷財的活動（嘩，租伊館，租金不菲呀！）多是甚麽宗派的週年紀念節目，又或是攪宗派內部團結時的手段，（即如筆者所屬的宣道會），總之，是點綴品！老實說，除了是「合一活劇」之外，大型佈道會不過是吃力不討好的大型節目，讓資源耗費在行政宣傳上，要提醒會友傳福音，幹嗎不透過更加有效的團契旅行、小型福音日？或者我們眞是太懶於傳福音了，生活見證簡直顯示不出信徒的應有特色，於是佈道會成爲提醒人傳福音，提醒人活得像樣點的「鼓勵咭」。表面是佈道，實質上是合一意識作祟，信徒分別爲聖的身份的確認。佈道實在不是目的，佈道會只是手段。

有人研究佈道會，擬出幾項事物以補助佈道會，簡單來說是：1.鼓吹會前個人工作；2籌備更佳跟進小組；3.規限目標對象（如靑少年人、信徒家長）；4.講道內容本地化等。然而，這些東西似乎並未針對整個教會發展事工的弱點。

福音的意義是創造主預備了救主來世，使人既能藉以悔改得救，與神和好，又能成爲至高無上的榜樣，叫我們效法祂一生彰示的愛、眞理、義……於是乎，此二者就合成基督徒的使命，基礎是罪得救，歸向神，與神和好，第二是立定人生的模型、路線、方向，好在社會人世中遵行神的旨意，有創意有活力地榮耀神。現在傳統基要派福音派的教會單重其一，不知其二，結果是決志人多得救人少，而所謂新派（這些都是極端化了的用語，是理想形態 IDEAL TYPE ，在現實中往往不是這般對立不同的），則單看其二，看重社會改革而忽視靈性轉向，亦屬歪理。

佈道會或許是人可以回轉的場合，但若轉身而後無出路，難免再重走老路，明知其不足而走下去。我們何不多想信徒的生活意義，具體的生活原則，以在這變幻莫測的世界做人，勝似惡性循環地製造一班又一班的決志而不得救的人兒，徒令有心人失望沮喪。

既愛且恨，唉，佈道會！

（本文作者爲《橄欖》編輯）

一次有意義的交流會
——朋輩神學團契後記

張圭强

編者按

本文作者爲張圭強，是中文大學崇基宗教系的同學，在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聚會多年。是八三至八四年度中文大學學生福音團契職員，兼團契社關小組負責人。於八三年十月間代表中大團契參加一個「朋輩神學團契」舉辦的福音派與普世派交流會，本文是該會後的記錄。

是次交流會程序分爲三部份。第一部份是一起吃飯，接着是由一位姊妹報告一羣福音派弟兄姊妹在溫哥華普世教會協會第六屆大會發表的一封公開信。（註1）然後中大崇基神學組講師郭佩蘭女士介紹兩篇文章，應就這兩篇文章講述幾次福音派和普世派的重要會議，兼且論及宣教中傳福音和社會關懷的關係的種種問題。最後是互相討論及交流意見。

由於原文頗長，特別是報告信件部份已經在八三年的《信息》十月號刊登，故此刪去，有興趣者可自行參閱該期的《信息》。而本文內容主要是保留了介紹文章和討論部份。

論述

是次會議討論的兩篇文章，分別是EMILIO CASTRO的“LIBERATION,DEVELOPMENT AND EVANGELISM:MUST BE CHOOSE IN MISSION?”和盧龍光牧師的《傳福音是宣講與服務的結合》

CASTRO是南美洲人，現任DIRECTOR OF COMMISSION OF WORLD MISSION OF EVANGELISM，所以在過去十多年經常參加宣教會議，而且是主要的策劃人和領袖。他的文章題目是標誌着過去宣傳路線不同的傳統和不同時期的特點。

福音派在過去這十幾年間對甚麽是EVANGELISM有許多的思想。在一九六六年惠敦會議，產生了《惠敦宣言》；到一九七〇年法蘭克福會議的《法蘭克福宣言》,對宣教工作仍然持保守態度;但比較突破性的是一九七四年的洛桑會議，CASTRO在文中也多次引用《洛桑信約》之各點，尤其是第四、五點，到一九七六年又有華福會議，是華人信徒參加完洛桑會議後覺得有需要走在一起，在華人間具體地工作，最近並且開了第二次會議。從中我們看到宣教路線有所轉變，早期的傳教和對其他宗教看法較爲偏狹，而自從洛桑會之後，教會對於社會服務及社會責任較爲注重，而且有許多較開放的教會有相當多突破性工作。

普世派方面在一九六八年在瑞典舉行了第四屆年會，帶出「人性化宣教路線」；而在一九七三年曼谷開了一個SALVATION TODAY的會議，對於甚麽是拯救和福音有較全面的看法。在一九七三年第五屆年會，主題是「耶穌基督——釋放與凍結」，講及社會公義和爭取人性化的社會。到一九八〇年在墨爾砵開了一個THY KINGDOM COME的會議。而到一九八三年在溫哥華開了第六屆會議，主題是「耶穌基督——世界的生命」。

在六十年代，普世派很強調DEVELOPMENT，由於那時要緊問題是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建設。到了七十年代DEVELOPMENT已成禁忌的字眼，因爲早期的DEVELOPMENT是經濟着眼的，人們覺得不夠全面，而且往往犧牲人的價值和生活質素，只有少部份人分享到利益。後來南美神學家GUTIERREZ在"A THEOLOGY OF LIBERATION"一書中提出了LIBERATION，而批評DEVELOPMENT這種思想再不適合南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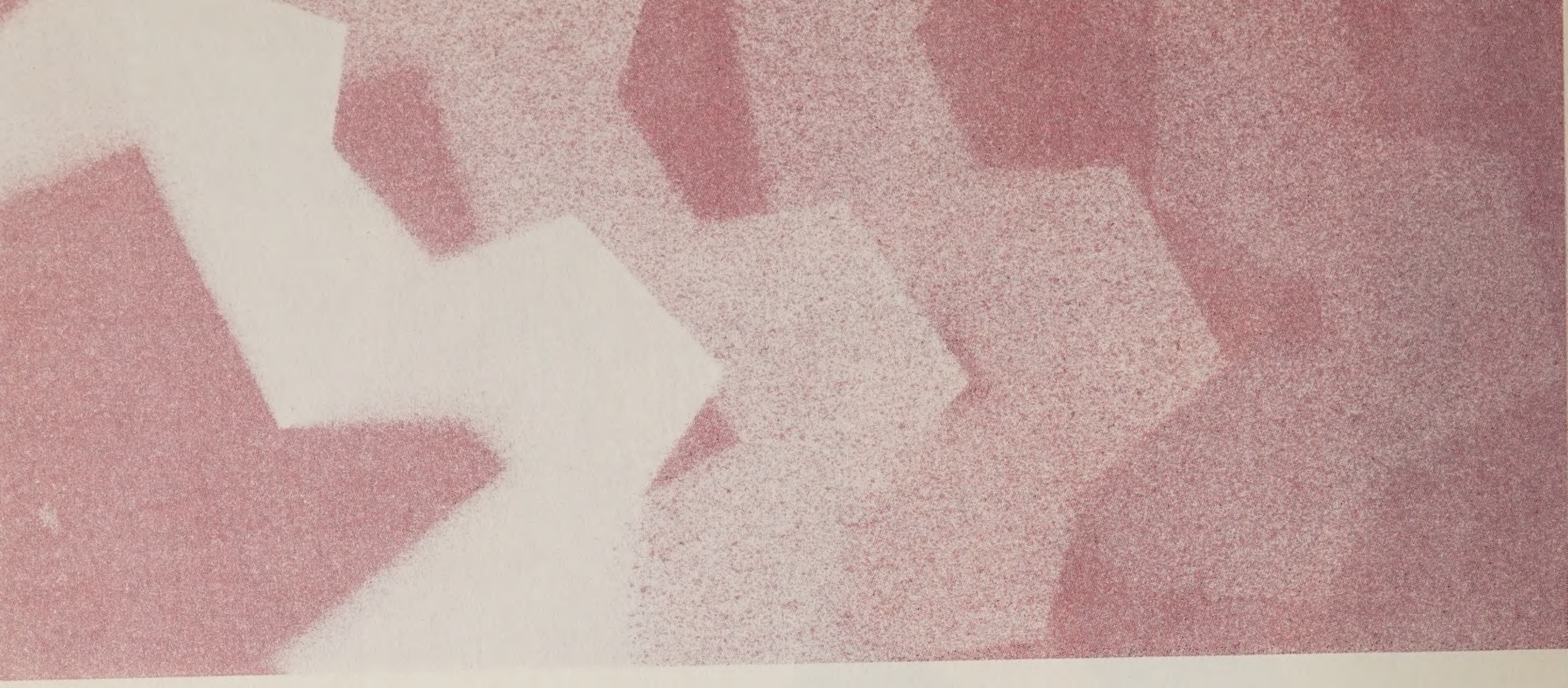
第二部份是討論EMILIO CASTRO的LIBERATION, DEVELOPMENT, AND EVANGELISM: MUST WE CHOOSE IN MISSION？首先講EVANGELISM，而JOHN STOTT可說是代言人，《洛桑信約》亦是他有份起草的，他所著的書"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對EVANGELISM有很重要的闡釋，他對於新約福音的了解是強調個人的認信，悔改和與上帝所建立的關係，EVANGELISM是很重要的，而且必要做，因爲拯救不等於經濟和社會的解放，若人沒有與上帝復和，怎能得救，所以EVANGELISM必定包括口傳，所以社會服務的福音工作中必定包括口傳部份。至於LIBERATION這個字本身很複雜，有多方面的意義，包括社會經濟體系的解放，個人的自由和人際關係的複和，LIBERATION特別強調在整個人類尋求釋放當中，教會要付上代價，與負責人站在一起，這便成爲很重要的差傳路線。

LIBERATION, EVANGELISM是否不可以調和，是否說我們一定要選擇？或是在不同處境有所突出？第一點也提及RECIPROCITY這個字，意思是互相補足的密切關係，即是EVANGELISM與CHRISTION SERVICE的互相補足（爲甚麽用CHRISTION SERVICE這個字而不用SOCIAL ACTION，因爲JOHN STOTT說MISSION等於EVANGELISM加CHRISTION SERVICE）。第二點是DIVINE MISSION IN ITS TOTALITY即上帝的差傳工作有無所不在和無所不包的特性；第三點是WHOLENESS，不是「斬件式」而是整全性。

第三部份是這些文章對香港教會有甚麽幫助，在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之間，我們看到很大的轉變，在七十年代，教會對社會參與，仍有保留，而社會福音是不被接納的，對社會服務與社會關懷則有相當多思想，到八十年代，我們已肯定社會關懷的重要性，問題變成如何做，而且如何透過實踐反省和闡釋信仰。究竟怎樣使我們的信仰不致偏狹？

傳福音與社會服務如何定先後次序？盧龍光牧師在《傳福音是宣講與服務的結合》中提出了一些本地的不同看法；在過往三十年中，香港教會有下列幾種分歧的看法：

(一)只傳福音，不作社會服務。
(二)社會服務是傳福音的手段。
(三)社會服務與傳福音各有價值而互不相干，是分割的。
(四)社會服務是傳福音的伙伴。



郭佩蘭老師更提出社會服務不單只是伙伴，而是福音的一部份，例如在使徒行傳中，傳福音與社會服務不是一定要選擇的。究竟那一種社會參與在面對一九九七下最有利於建設香港社會？在面對五百萬人的惶恐年代裏，福音是甚麽？在面對十億人的無神論的處境裏，福音又是甚麽？

討論

這次交流會的主席是林壽康先生（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幹事），出席者包括盧龍光牧師，其他教會的牧師，傳道人和神學生等人。根據我個人粗略的見解，整個交流會討論以下四個問題：使徒行傳裏傳福音與社會服務是否分割的？傳福音與社會關懷的關係應該是如何？福音派與普世派的神學的分歧是甚麽？福音派與普世派如何彼此包容？最後我以盧牧師和郭佩蘭老師的一段話作爲總結。

當郭佩蘭老師完結了她的談論後，有一位弟兄提出使徒行傳中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是分開的，例如彼得和一個使徒奉耶穌的名醫治一個人；而另一位姊妹用使徒行傳第三章中彼得醫治一個人，奉主的名叫他行走，然後往殿裏讚美上帝，這個過程中，她相信那人已經領會明白福音，我們又可否否定這不是福音？筆者此時引述司徒德牧師（JOHN S-TOTT）“ONE PEOPLE-HELPING YOUR CHMCH BECOME A CARING COMMUNITY”一書裏面提及的WITNESS觀念，在使徒行傳1：8所講及的見證觀念是用口傳述耶穌的生與死，不單是指個人生命的歷程，而是見證耶穌的出生、生活、死亡、復活、升天和再來。所以司徒德反對以個人生命流露就是傳福音，而是作爲一個見證人，必須宣講耶穌基督。

有一位弟兄談到若要我們傳福音傳得到的話，必須透過生命的流露，要給人感受到自己的誠意和感情，所以傳福音與社會關懷不可以單獨出現而又祈望達致效果。而另一姊妹回應出我們不可抽離處境而傳福音，否則只是講一個虛無漂渺的概念。

林壽康認爲福音派與普世派在歷史上有很大的分別，但我們共同面臨八十年代很大挑戰的世界，故此我們各行一步，彼此走近了，CASTRO 在其文章提出了彼此在變，故此我們不可以否定別人，因爲時代不同，對我們個人信仰的呼召和要求不同，所以傳福音與社會關懷不一定是伙伴，可以是替換的，但基本上我們肯定這是福音的事工或耶穌要我們所做的；至於怎樣做就要大家對話，不單止停留在語言上，要用行動的參與。

接着有人問：「福音派與普世派如何劃分呢？」盧龍光牧師認爲這些名詞沒有嚴格的定義，有一本書提及福音派本身已有十幾種，這是由於西方哲學和歷史背景帶來，但有否一些比較上清晰明確和共通性的分別呢？林壽康認爲普世派比較上是B-IBLICAL SCHOLARSHIP，用CRITICAL的態度看聖經，而福音派比較LITERAL看聖經；普世派注重救贖史與人類歷史結合來看，而福音派則是分開來看；普世派較注重羣體大衆方面，而福音派則注重個人的層面。筆者也提出了一些看法：



「有些人會覺得普世派可能定義福音爲TO BE TRUELY HUMAN-BEING，現世即天堂和除祂以外，還有拯救——異教徒的生命，這些都是福音派接納不到的。」林壽康認爲我是從一個靜態角度去看，可從一個較動態角度去看，用新的方式語言語解釋事物；另一位弟兄提出造成不同是歷史因素和彼此在時間的限制，便有不同的重點和工作；一位姊妹提出彼此之間在得救上基本是不同，但其他人反對，最後由郭佩蘭老師澄清。

她認爲我們中國人的性格裏有包容和謙厚性情，這是她從唐君毅談中國文化物質中學習而來的，中國對各宗各派都可包容和涵攝，例如佛教，而且各宗教基本上能和平共處，中國人的涵攝性要發揮而且擴而充之，她說：「何必將在外國打了幾十年仗的爭論帶入中國，特別在面臨這危難時代，何必要彼此LABEL和強調分裂？」

接着有人問：「我們對立的形勢是否那麽嚴重？」

林壽康說基督教協進會受到許多無情的攻擊和批抨，我回應他說：「我相信福音派有些人對普世派偏見很深，我認爲認識不足便無資格作批抨或判斷，但大家以往用了很多嘲笑和責備的態度，我相信解決問題是需要更多主動性的溝通和大家有更多尊重和接納的愛心態度。」

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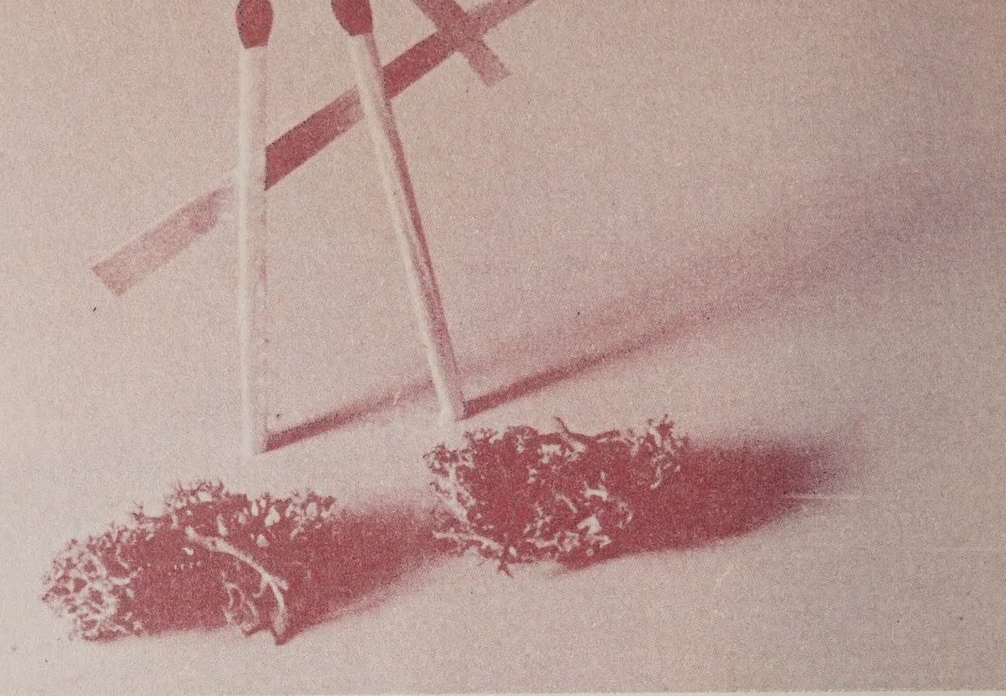
盧牧師：「我相信張主強代表了某一些人的反應，這個情況現在已經好轉了，但仍然彼此之間還很敏感，我的背景是福音派，在崇基讀研究院時亦給人嘲笑，我自己『無所謂』，但互相嘲笑的氣氛仍然存在，這是由於繼承了西方的傳統，我們往往爭辯的時候不是那麽理性，而是感情的傷痕；我在福音派中有人說我是『開明』，而在普世派中又被稱是福音派。福音派與普世派同時存在是好事，大家都在有限制之下不願完全做了所有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彼此欣賞，對話和合作，例如福音化和民主化二者都有相同之地方，以致大家生命更爲豐富，最重要的不只是豐富自己，而是使世界的生命因福音豐富起來。」

郭佩蘭老師：「我想將這邊問題推向更大層面，即是中國怎樣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在大陸曾訪問南京金陵神學院，有機會與丁光訓主教談及中國神學路向：『我並不希望造亞協洲版本的解放神學，我們要處在中國教會本身面對的問題，中國教會大部份屬保守派和福音派。所以，我們的神學過程是怎樣與保守派和福音派有溝通的地方，這便是中國和解神學的特色。過去有許多誤解和傷痕，現在我們要學習彼此欣賞對方，我們欣賞福音派對耶穌救恩的工作的熱誠，他們亦欣賞我們對社會的關注。當我們彼此之間有和解後，下一步便和廣大人民和解，或爲他們一部份，參與他們的掙扎，顯示我們的決心也和他們站在同一線上。』這些正是我們共同面對一九九七的借鏡。」

註①刊登基督教協進會的通訊八三年十月號
②刊登於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會訊1982.12.15

同負一軛

陳念聰



經過幾許的困難和考慮後，終於決定執起筆來，寫下這篇文章。我心裏有一個很大的希望，就是我們同屬一家的弟兄姊妹，能夠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爲一的心，因而我們所得的福音，信徒之彼此造就，就更得神的喜悅了。環顧我們各樣的事工，不時也有互相批評的情況，雖然大多是出於愛心，却有不少時候，是未能了解到神的工作也有很大的活動性：「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却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別，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別，神却是一位，在衆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我們在時間上的分配也因而有別了，亦不等於是輕視了其他的工作。既然我們知道這些都是神所喜悅的工作時，也就不必強使別人跟從自己的看法了。

或者大家很有興趣知道筆者對「門徒訓練」(1)有什麼意見，但我想說一聲：「且慢」！這篇文字的主旨不是在後頭，乃在於剛才所說的一段話。無論你有否參與「門徒訓練」的工作，只希望我們能夠學習除去任何成見或者嫉妒，爲神的教會齊心努力，彼此激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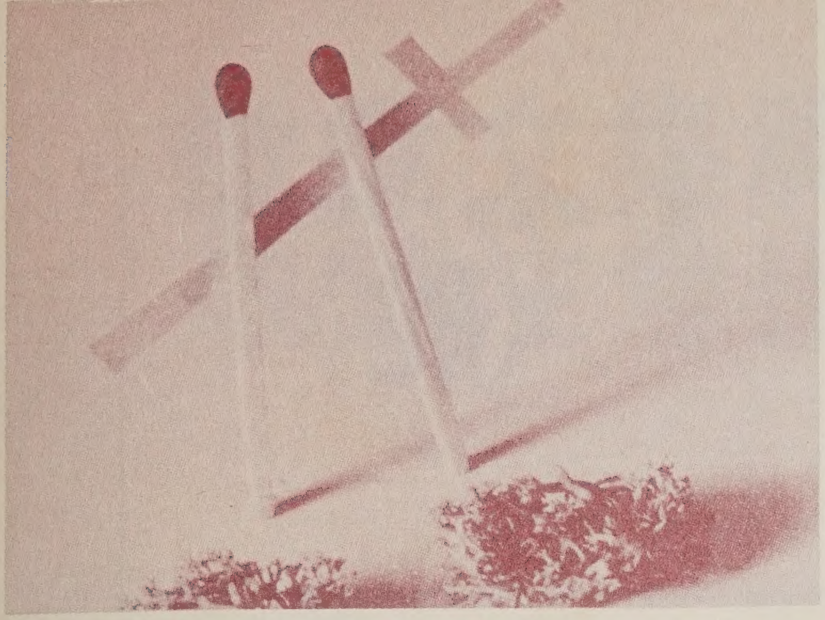
「門徒訓練」在香港已經有數年的工作，造就了不少信徒，筆者亦有機會接受過這樣的栽培，而深感到這種工作的重要。普遍來說，香港很多的教會都處於低落的境況，對個人生命的長進及傳福音的心志都只有不冷不熱的態度而「門徒訓練」的興起，正在很多弟兄姊妹的面前提出挑戰，改變了他們的生命，更提醒我們要再三反省自己的現況，又要重拾起初那種對主的摯愛，和願意爲主使用的精神，從而讓我們的教會有復興的希望。

我們都知道個人的栽培工作對於初信的信徒是不可缺少的，除了在眞理上的學習外，還要幫助他解決不少困難，以及過一個基督徒應有的生活，使他對神的獨立追求上得以建立。「門徒訓練」所強調的生命的交流，以身作則的方法也正針對這樣的需要，更希望能夠在日後長進的路上互相扶持，對我們這永遠的生命更有把握。另一方面，「門徒訓練」對聖經重視的態度也是值得學習的，除了經常的個人及小組查經外，還有不少在研讀聖經上的輔助資料和方法，如果能夠適當地運用，確能給予信徒極大的益處。

「門徒訓練」對傳福音的態度也是非常認眞的。雖然有部份弟兄姊妹未能完全接受或同意其中所用的方法，但無可否認，神已經表示祂使用這些工作，不少人是在這樣的機會下決定跟隨主的。傳福音是神所賜下的一種恩賜，各人不同，其中也有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層面，我們不應過於計較領人歸主的數目，反正神通常都讓人接觸不同的基督徒而最後決志的。但反過來說，我們更不應以此爲藉口，放鬆傳福音的心志，其實如果我們在神的面前誠實自問，就知道自己盡力多少，欠債多少了。

「門徒訓練」的工作也不只限於筆下的描寫，當中有不少的經歷和學習，也只有參加的弟兄姊妹才能領會得到。筆者對「門徒訓練」的觀念和其中強調的對神的完全委身是非常欣賞和贊成的，但由於人自己的有限，在工作的進行裏，也有些問題繼而產生，雖然絕不可能一概而論，但在這裏希望作一分享，讓我們都能在主的工作中更加進步。

筆者認爲現在所進行的「門徒訓練」工作，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結構，如果有覺得這些是已經足夠，甚至是其他工作都應該朝向的路線時，就有點不當了。人所能作的及其方法都是有限的，不能完全的，所以我們應該知道某一種工作的限制，而適當地鼓勵弟兄姊妹去欣賞或接受其他工作的影響和造就，從而發揮肢體互相配搭的功用。眞正能夠訓練門徒的，還包括很多其他不同的方面，如文字工作，鄉鎮關懷，其他不同形式的福音工作，或不同性質的團契聚會等，而弟兄姊妹對這些也有不同的領



受，對人本身的接受程度也很獨特。因此，以現時「門徒訓練」所能夠提供的屬靈上和事奉上的造就，也不是整全。而這等的限制也會隨著工作開始組織化和方法的統一而更加明顯，尤其是當有「門徒訓練」與非「門徒訓練」這等界限的概念漸漸形成起來的時候。當然，這也會因帶領者的個人經驗、成熟程度和對周圍事物的認識而有很大的不同，又因學習者個人對各類事物的醒覺性而異，不能勉強。

但無論如何，在工作範圍的限制下，筆者認為擴濶門徒的視野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們不應將個人長進和關心周圍視為不同的步驟，其實，這些往往是相輔相成的。特別是「門徒訓練」和教會的關係，更不可大意，須知道各樣的事工都是以建立教會為基礎，而絕不能取而代之，有時我看見某些「門徒訓練」的聚會時間經常與教會的活動相抵觸，而又不是沒有其他辦法，或甚至教會的領導對「門徒訓練」小組的開始也不知道，又見小組的內容與教會的方向脫節等，心裏總是有點不安，雖然每件事都由其獨特的因素構成，但我總相信教會與門徒訓練之間的相通，必定可以加倍改善的。

主耶穌曾經說過：「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夫子，你們都是弟兄。」又說：「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主耶穌可能不是完全禁止「師尊」這樣的稱呼，而是祂看出人的軟弱來，祂知道人都是不完全的，而人却容易對人或事物產生倚賴，甚至崇拜，而被尊崇的，又會飄飄然的驕傲起來，就像當時主所針對的法利賽人一樣。

筆者認為「門徒訓練」中的帶領者，在靈命上應該有一定成熟的表現，即或不然，也應該有成長的弟兄姊妹從旁密切的幫助和提醒他們。雖然這是「門徒訓練」中的理論，但照筆者的觀察，由於這工作興起迅速，甚至部份帶領者有「負荷過重」的現象，生命的傳遞似乎與知識的傳遞和工作本身分割，而甚至失去平衡，引致被造就的感覺到「公式化」、「機械化」、「單方向傳授」、「人為的壓力」或「有點隔膜」的情形。帶領者靈命的幼嫩常會造成只有形式的工作方法的傳授而已。這些都是一些我們須要正視的問題。“THE KEY IS TO DO IT SLOWLY AND NOT TRY TO DO TOO MUCH WITH TOO MANY ,TOO SOON”(2)「門徒訓練」不宜過於著重其工作效率而疏忽了眞正對人的了解和支持，否則只會剩下交功課和參加「門徒訓練」的活動。反而更應對其他事工和弟兄姊妹加以了解，以及在一些人際關係上學習，接納各樣不同性格和恩賜的弟兄姊妹，又或者是特別指出一些容易犯的軟弱，如因工作效果而驕傲等。這樣，可以使整個人的成長更加健全，也可以使更多的弟兄姊妹了解和參與「門徒訓練」的事奉了。

在主耶穌的榮光下，顯出我們的罪孽來，我們之所以蒙赦免，甚至能被主所使用，完全都是出於主的恩典，我們一無可誇，唯有主的十字架。因此，我們不能判斷人，不能計算人在神眼中的價值。不只是「門徒訓練」，其實任何一種事奉，都會因人的軟弱而產生問題，我們倒應「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單顧自己的事，也顧別人的事，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神造我們各人不同，以成就更美好的身子，肢體是多的，身子却是一個，沒有任何人的方法或制度是完全的，是適合每信徒的，惟有各肢體都一心以基督為首，愛主愛人。「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這樣豈不是神所喜悅的嗎！

註　：

1. 此處「門徒訓練」是指現時在香港已經開始了的一種事奉方式，強調個人生命交流、讀經、傳福音等，並非泛指一切栽培事工。
2. 節錄自“THE LOST ART OF DISCIPLE MAKING”BY LEROY EIMS

編輯先生：

閱畢貴刊42－43期中的「本地宣教新動向」專題，頗覺內容豐富，所介紹的數個宣教路線或組織都算新鮮，是為香港教會的新路向。唯對於「新邨・新人」一部分，筆者有些感想欲提出討論一下。

筆者並未親身參予「新邨・新人」的計劃，但却認識相當數量有份參予的弟兄姊妹，也一直十分關心此計劃。貴刊在介紹此一計劃之時，語調方面似對此計劃予以相當正面的肯定，並謂「新邨・新人」「是踏進社區教會模式的第一步」，「在『新邨・新人』的行動中，他們（參加者）嘗試以僕人的態度，走到兩所新屋邨中為他們服務，……犧牲自己的時間精力、把十字架活在他們當中。」，「不單是決志者，就是未信者，對基督徒也會從一個良好的第一印象開始，漸漸對教會產生好感……」等等。但在連串肯定之餘，筆者有兩點感想。

首先，是關於是次計劃的模式。筆者認為所謂「社區教會」的最重要意義就是「道成肉身」，住在人們中間，認同他們，與他們共存亡，以僕人身份服務社區。但反觀「新邨・新人」的計劃，是數天內突然有九百多個陌生人，駕臨某個社區，這羣人均不屬於該社區，也不瞭解該社區，存在的時間也只有短短數天，帶來了一連串多釆多姿的服務與活動，加上一些福音性聚會。數天內，這羣人離開了，留下了一個傳道人，建立了一間教會，服務沒有了，活動也完了，剩下的是一間普通教會的聚會。筆者的疑問就是這樣的方式似乎跟一個「社區教會」的基本意義有所違背，這是否眞的「道成了肉身，住在人們中間」呢？

其次就是關於區內居民對基督徒印象的問題。側聞現在留任於該新教會的工作人員正幹得吃力非常，原因是衆多的決志者正待牧養，又居民經常到來尋求各樣的援助服務，但這些都非該新堂所輕易能供給的。筆者的疑問就是當居民及決志者今天得不到他們所期望的供應時，那群曾以「僕人」模樣出現過數天的基督徒究竟留下了一個甚麽印象給當地居民呢？筆者似乎不敢完全樂觀。

提出這些個人感想並非懷疑「新邨・新人」的參予者的熱心及誠意，只是想深入點反省一下這種模式的實際效果及意義，以致對其價值可以下一個更中肯的衡量。筆者對所謂理想宣教模式並未有肯定答案，只希望有更多弟兄姊妹就這問題發表意見及討論，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願以馬內利！

讀者　施娣芳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

萬千瀚海舟，汝舵誰掌？

《舵》

摸索大專基督徒身份的意義
且看人生的目標與生活方式
怎樣與國家社會校園成長結合

面對時代挑戰
大專基督徒不可不看的文集
牧師傳道神學生認識大專生必備書本
教會圖書館必備
各大基督教書室有售
每本零售十三元五角正

橄欖文集將面世
敬請注意出版期



下期預告

1. **橄欖廿五週年特大刊**
   賀詞及回顧
2. **專題：九七與教會**
   ——從中國教會歷史看九七與香港教會
   ——張慕皚、李景雄、蔡元雲談九七與教會
   ——基督徒在這時刻可爲香港做甚麼
3. **專文**
   曾家達先生的神國觀
   陳榮輝談學運參予
   《不滿與了解》專欄首次刊出

香港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

會長　鄭建輝博士（化學系）
副會長　華叔平醫生（醫學系）
主席　關啟文（工三）　出版秘書　林潔儀（社二）

橄欖雜誌：

顧問：滕近輝牧師　蔡元雲醫生　張慕皚博士
吳宗文先生　許道良博士

出版委員會

主席　黃鳳萍（社二）
總編輯　陸錦光（社二）
助理總編輯　譚啟見（社二）　黃冠雄（文二）
編輯：　蘇兆良（工二）　袁淑芬（醫二）
周華山（社二）　麥淑娟（文二）
羅惠嫦（社一）　朱惠兒（文一）
陳國宏（工一）
文　書　林水招（文二）
資料組　楊啟昌（理三）　沈濟全（文二）
錢錦華（工一）　鄧淑儀（社一）
李潔貞（文一）　蔡婷婷（社一）
陳子玲（文一）　駱惠芝（文一）
業務組　梁玉嬋（理二）
吳國泰（社一）　陳志强（工一）
設計　梁健德（建一）　譚啓見（社二）
李燦輝（建二）　杜聯基（建四）

通訊處：香港西營盤郵箱 50379 號
承　印：南北文化服務社
九龍長沙灣道47—55號
東成大厦十樓C座
3-806890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為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第二十四卷第五期　公開發售第四十四期　一九八四年二月

目　　錄

稿件

㈠稿件以中文為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㈡來稿請附真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㈢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㈣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㈤本刊不設稿酬
㈥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㈦來稿請寄西營盤郵局信箱50379號，「橄欖」收
㈧本刊登載文章，文責作者自負，並非代表編委會立場

每本售價五元正　　訂閱全年二十八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